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四期
2011年05月　　頁223~28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關於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及其型態的特徵

黃　蘭　翔*

摘　要

首先，本文問題意識的提出與過去不同，不再單純找尋在臺客家與閩南的泉州、漳州建築之差異為目的，反而是思考為何兩者之間如此相似的原因。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問，是因為前往所謂的客家「原鄉」進行田野調查時，這個「原鄉」也只不過是渡台先民們，在中國長期遷徙過程中的一個「轉繼站」，而不是客家族群的起源地。這雖是簡單的事實，但卻是非到訪原鄉地無法輕易理解的事情。因此本文不再以找出臺灣客家建築的「靜態特徵」為目標，而是著重於原有漢族文化的合院建築共通性的討論。如今無論是存在於臺灣客家原鄉的粵東、閩西或是贛南的建築形態，甚至台灣的客家建築所表現的特徵，都是經過多次移民遷徙、定居，因應各時代的社會情境，融合各地風土民情一時性的「動態發展」之結果。

因為田野調查改變了研究問題的發問，同樣是田野調查帶來的觀點，亦即在 20 年前即已在台灣發現，但又苦於提出合理解釋的客家建築「雙棟」作法。因為田野調查，知道這種作法在中國是不限定客家建築才有的特徵。更且有不少案例不僅有「雙棟」，甚至「桁檁」與「椽木」（桷木）也都採上下獨立的雙層作法，亦即完全的「雙重屋頂」結構。因此，幾乎可以確定認為臺灣「雙棟」是「建築結構部材」經過歷史發展變遷後的結果。而這種「雙棟」或是「雙層屋頂」作法，甚至可以上推至中國上古時期即已存在。既然客家建築或是偏遠地區的建築，仍保有古代的作法，同理可推，當今存在於中國中心文化偏遠地區的臺灣，其傳統客家建築是否仍保有古代中國建築特徵之片段痕跡？這是今後客家建築研究，或是整體的閩粵建築研究可以期待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臺灣建築　客家建築　移民原鄉　雙棟　邊陲與中心　中國建築

99.08.30 收稿，100.02.23 通過刊登。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開宗明義，本文是嘗試回答「臺灣客家建築特徵」的文章[1]。目前在臺灣研究研究客家傳統建築，通常面臨如何區分客家建築與閩南泉州、漳州建築間差異性的問題。於1980、90年代時期，通常界定其特徵爲少裝飾、白粉牆面、多使用自然材料，如卵石牆腳、卵石鋪禾埕等等[2]。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調查資料的累積，特別是臺灣南部高雄縣與屏東縣客家住宅，其合院建築的背後存在「化胎」，神明桌下祭祀土地龍神，在屋脊棟木採取「雙棟」等特殊作法，近年來這些特徵即被視爲判別客家建築的重要特徵。這些特殊性的作法在中國原鄉地的情形如何？爲何在臺灣的閩南建築不存在這些現象呢？

然而就整體性而言，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間的高度相似性仍是困惑研究者最大的古典問題。傳統客家建築研究者李允斐曾指出北部客家建築受到在臺閩南建築影響大，而南部客家受到的影響小之論述[3]。的確，分佈在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後兩縣簡稱爲竹苗地區）一帶的北部客家建築，一般在面對內庭（禾埕）的正身與左右兩廂的外牆，其與內部房間之間，都通以迴廊聯繫內部各房間（圖-1）。高雄縣、屏東縣與中國原鄉的客家建築相似，不通以內、外廊，各房間直接獨立對外開門（圖-2）根據1928年日本殖民地政府所作的籍貫調查[4]，可以知道南北客家移民的出身籍貫並無太大的差異，可見李氏的論述有

1 本文是參加「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整體計畫下的子計畫 28「新苗地區建築基本史料的收集與「臺灣客家建築史」的建構」研究成果之一部份。

另外，在論文出版審查過程中，對於匿名審查委員耐心審讀這篇以「客家建築研究」為題的研究論文，心存感謝。因為「客家建築研究」就如「客家研究」一般，是否可以成為研究題目都尚有爭議，但是審查委員細心而親切地賜給了積極性的意見，使本文的錯誤能夠減少到最低限度。

2 過去雖然沒有看到學術性論文分析客家建築造型的曲線彎曲較閩南建築來得和緩，呈顯了清爽直勁的特質，但在藤島亥治郎著書《臺湾建築》裡針對廣東系與福建系建築進行了簡單的比較，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而藤島氏的著書於 1990 年代初期，即已被翻譯成中文版（詹慧玲編校，《臺灣的建築》），對臺灣建築學界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或許就是因為如此讓這種客家建築觀在臺灣社會裡維持了一段時間。

3 李允斐，〈由南北產業的差異看客家民居形式〉，收錄於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志》上冊（高雄：美濃鎮公所，1996），頁 190-204。

4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當的可信度。只不過於客家原鄉的粵東、閩西與贛南幾乎不存在紅塼建築，然而臺灣客家不分南北都擁有使用紅塼蓋房的熟稔技術，換言之南北客家建築都具有強烈的閩南特色，這也說明了儘管其有南北的差異，但都與閩南建築有密切的關係。

另一方面，若在國際層次論及客家建築，大家所聯想到的不是上述這些在臺灣好不容易調查出來的特徵，而是福建客家的土樓。不僅在傳統建築研究上，在新建築的創作上，如新落成的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大樓、新竹縣立文化中心都以福建圓形土樓之基本原型作爲設計構想。然而這種現象卻使臺灣的客家建築研究者感到困惑，亦即爲何臺灣不存在土樓式的客家建築？到底臺灣的客家建築的論述還成立與否？公開提出質疑「臺灣爲何沒有土樓？」是在2005年2月，王雯君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的投書，立即有廖倫光的回應並作積極的討論[5]。對於這個問題，一方面隨著學界逐漸理解閩西、粵東與贛南各地具有不同形態的客家建築，另一方面知道臺灣客家人大都來自粵東的嘉應州，理解到臺灣不存在閩西圓形土樓反倒是自然的現象。[6]

問題是綜觀中國漢人建築，其閩西客家圓形土樓是非常具有特殊性的存在，特別是中國自上古周代以來，即已存在重視禮制、長幼有序的合院建築形態，但是圓形的土樓，正好將所有的尊卑秩序均質化。這個建築現象發生在自認保有中國自古以來保守性格的客家族群確實令人覺得奇怪。這種重視倫理秩序的合院建築，漢人自古至今都持續而不衰。甚至於漢人居住在河南省、山西省、陝西省與甘肅省地區的窰洞裡，仍然對其固有秩序有所堅持[7]。在這種情形下雖然與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未必有直接的關連，但是閩西的圓形土樓已爲世人認定是客家建築的原型，對於先民移民自中國的客家人實有必要對其建築形

查課，1928）。

5 王雯君，〈廖倫光評「臺灣為何沒有土樓？」〉，收錄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24期，2005年2月15日。http://140.115.170.1/Hakkacollege/big5/network/paper/paper24/22.html （2010年9月17日讀取）

6 王雯君的投書中，整理莊英章在「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筆記，提出下列五個原因說明臺灣沒有圓形土樓的原因，亦即：（1）當初從大陸來臺者都是單身，不符合土樓為宗族聚居的概念。（2）臺灣漢番之間是因為政府介入，土牛溝界線明顯，不需要土樓防禦。（3）來臺者經濟力不足以建造龐大土樓。（4）年代不夠久遠，所以單姓村的延續難以維持。（5）土樓集中在閩西，但客家移居者多是以粵為主，則他們來到臺灣前原本就非土樓居住者。

7 劉敦楨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頁330-3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態有所理解。

二、臺灣客家建築的出處與客家土樓出現的解謎

根據林浩在著書《客家人の原像》[8]中的推測，當今客家人的人口有約6000萬人，主要的居住地在中國華南的丘陵地帶、南海沿岸與島嶼各地、四川盆地，進一步在東南亞、南美、印度洋各島嶼及非洲南部各地，聚集各處過著團體生活。其他還有在歐美各國及日本點狀散佈著數千人至數萬人的客家人聚居處。特別是林浩以文化人類學觀點所稱的大陸型分佈[9]，其在中國境內的廣東、福建、江西三省區域的客家文化中心地帶，也是本文所說的中國客家人原鄉地，亦即廣東省東部的梅州（舊稱嘉應州）、福建省西部的汀州與江西省南部的贛州之地域範圍[10]。在中國、臺灣境內的客家人分佈，可以片山和俊所繪製的客家人分佈圖作簡要的掌握（圖-3）。

（一）臺灣客家人的祖籍地及其建築形態的出處

通常研究移民建築時，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比較移居地與原鄉間的建築形態之異同。在此也不例外，首先來看看臺灣客家建築與原鄉之間的關係，我曾在2007年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的「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以〈高雄美濃客家建築遺風所說的漢人建築空間的本質——以化胎與墓塋型土地公爲中心〉爲題發表過文章[11]。當時以建築後側的「化胎」、以及由

8 林浩著,藤村久雄訳，《アジアの世紀の鍵を握る客家の原像：その源流、文化、人物》（東京：中公新書，1996），頁90-99。

9 其他還有次大陸型分佈（粵北客家次大陸與東江客家次大陸）、大島型分佈（粵桂瓊港客家群島、閩臺客家群島、贛中贛北客家群島、湘東湘南客家群島）、小島型分佈等類型。

10 中國廣東省東部梅州客家文化地區的分佈，以現在的梅州市為中心，周圍包括梅縣、大埔、蕉嶺、平遠、興寧、五華、和平、龍川、紫金及豐順的10個純客家縣。閩西汀州客家文化地區的分佈，以汀州為中心，包括武夷山脈東側的寧化、清流、長汀、連城、上杭、武平、永定等7個純客家縣。贛南贛州客家文化地區的分佈，以贛州為中心，包括寧都、石城、興國、于都、瑞金、會昌、贛縣、上猶、南康、崇義、大余、信豐、安遠、尋烏、定南、龍南、全南等共17個純客家縣。

11 黃蘭翔，〈高雄美濃客家建築遺風所說的漢人建築空間的本質——以化胎與墓塋型土地公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12年20-21日，地點：南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大樓北棟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央核心院落建築後側的後圍屋與位於左右兩側對稱的護龍屋圍繞，以及建築整體宛如「太師椅」的造形，形成前低後高之住宅型態，推演出一個結論，認爲臺灣客家建築傳承粵東客家圍龍屋形式。

如今分佈於臺灣南北的客家建築，如李允斐所言其與閩南建築在長時間的互動過程裏，已經發展出一些差異性的特徵。但是如表一所示，我在2008至2009年於苗栗縣進行客家建築的調查，可以知道臺灣北部的建築仍然具有與六堆客家典型的雙棟木、土地龍神、化胎等建築的特徵。[12]換言之，從建築外顯的特徵來看，南北擁有共同根源的可能性大。前文已經提及根據1928年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所進行的調查，知道臺灣客家移民無論南北都來自粵東的嘉應州者眾。

施添福曾經根據上述的調查結果，指出「清代在臺的客籍居民，絕大部分來自粵東的潮州、惠州及嘉應州等州府，及閩西的汀州府」。[13]陳運棟所整理的《臺灣的客家人》中，進一步將廣東省項下的潮州府、嘉應州、惠州府及福建省項下的汀州府人口數加以合算，指出當時在臺定居的客家人的祖籍分佈比例，以古嘉應州（包括鎮平、平遠、興寧、長樂、梅縣等縣）的客家人爲最多，約佔（全部臺灣客家人口的）二分之一弱。其次是惠州府（包括海豐、陸豐、歸善、博羅、長寧、永安、龍川、河源、和平等縣）的客家人，約佔四分之一。再次是潮州府（包括大埔、豐順、饒平、惠來、潮陽、揭陽、海陽、普寧等縣）的客家人，約佔五分之一強。而以福建汀州府（包括永定、上杭、長汀、武平、寧化等縣）爲祖籍的客家人最少，僅佔十五分之一。

可見這種絕大多數臺灣客家人來自廣東的說法，廣爲臺灣學界所接受，但這些意見卻遭到「中國臺灣網」網站所刊載的文章「臺灣客家人探源」的質疑，認爲福建汀州府才是所有客家人的祖籍地，根據客家人的遷徙歷史及客家姓氏族譜記載，不論何姓的客家人（當然包括廣東省嘉應州府、惠州府和潮州府的客家人），其祖先都曾徙居過閩西——福建汀州府，基本上都把最早遷抵閩西的那代祖先奉爲始祖或一世祖。那麼居臺客家人的祖籍當然要算是閩西。[14]的

樓第一會議室。後來將該文改寫以〈漢人の『宗族倫理風水観』からみた臺湾の伝統的民家〉為題，收錄於玉井哲雄編，《歷博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08　アジア比較建築文化史の構築―東アジアからアジアへ―報告書》（佐倉：国立歷史博物館，2009）。

12 陳淑玲、賴福林，《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建築篇》（屏東：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頁59、78。

13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與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1987），頁156。

14 「臺灣客家人探源」，『中國臺灣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確，若我們前往嘉應州從事田野調查，就知道這種說法是當地居民的共識。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新竹縣新埔鎮上枋寮的劉宅爲例得到證實。在民國73年（1984）於其屋後設置的公共墳墓「瑞閣園」，立有落款民國73年的「瑞閣園沿革志」碑。記述其11世祖瑞閣妻詹氏攜子與姪兒等人，於1755年從廣東楊康渡海來臺後散居各地，12世祖延轉於1781年舉家遷居枋寮，開基立祠至今。與碑並立有石刻「歷代遷徙圖」（圖-4）。根據圖上所繪，於歷史傳說時期的唐堯時期，起自第1代大始祖駐居山西臨汾至遷居枋寮的延轉爲第158代。其祖先自大始祖開始輾轉遷徙，至第122代劉翔，亦即在唐代（884）時，從河南洛陽遷至福建汀州；至第141代劉承信，於南宋（1195）時，從福建汀州徙至福建永定；至第144代劉建陽，又於南宋（1249）從永定遷徙至廣東省溪口；到了元代傳至第147代信卿，再從廣東溪口遷居廣東楊康。到了第157代的劉瑞閣妻詹氏則渡臺開墾至今。

從上枋寮劉宅案例，可知其祖先在福建汀州駐居了19代後，遷至福建永定駐居了3代，後來又遷往廣東東部的溪口，駐居了3代，再經廣東楊康駐居10代，後來渡海來臺開墾。可以知道劉家在渡臺之前，雖然曾經居住過福建永定的圓形土樓區（圖-5），相對其從第147代到157代近200餘年所居住的非土樓分佈區要短暫許多，或許就是因爲居住時間的長短，造成其祖先在臺興建家園時，直接受粵東建築的影響更甚於土圍樓分份區的福建永定。

因此我們討論臺灣傳統客家建築特徵時，必須更審慎處理其與來臺祖之祖籍地建築傳統之間的相關性問題。也就是說，在臺論述其祖籍地時已經無法單純以其來臺第1代的出身地作爲其祖籍地，但是上述的「臺灣客家人探源」，其論述客家人都來自福建汀州的機械性歷史事實，對客家建築文化的理解也不見得有太大的幫助。在此要強調的是，不論在臺客家人屬於廣東籍或是閩南籍，都沒有改變自古以來福建汀州府與廣東古嘉應州、惠州府及潮州府密切關連的事實。其實就如同圖-6所示，在中國客家的原鄉地閩西、閩西南、贛南與粵東，因移民定居的歷史發展及在當地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產生出當今不同的建築形態。臺灣的客家建築主要傳承自粵東以梅州爲中心的客家文化地區。[15]在此先

http://big51.chinataiwan.org/twzlk/twgk/mz/200802/t20080227_594630.htm （2010年9月17日讀取）

15 關於「臺灣客家建築傳承自粵東」的說法，房學嘉（現在是中國廣東省梅州市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長）曾於2006年2月，來臺灣從事客家建築調查，並且在中央研究院臺灣使研究所進行演講。他指出臺灣高雄縣、屏東縣一帶客家建築所存在的「化胎」作法，雖然形式有所變化，但基本上是傳承自粵東客家建築的習慣。作者受其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所謂的「臺灣客家祖籍地」與分佈於客家原鄉之閩粵贛建築形態界定清楚。

（二）客家原鄉的各種建築形態

如圖-6所示，在閩西、閩西南、贛南及粵東都各自存在不同的客家建築形態。在閩西南的南靖、永定一帶有圓形或方形等形狀的土樓（圖-7）。同樣具有防衛性格，甚或有過之的贛南住宅，稱之爲「土圍」、「土圍子」或「水圍」的圍屋；在圍內則配置著與閩西土樓內部不同的建築形態（圖-8）。值得注意的是同樣位於閩西，比圓形（方形）土樓的防衛性要弱得多，但很有名的客家住宅永定「五鳳樓」也位於閩西南（圖-9）。在閩西的汀州客家文化地區，與江西省交界處，則採取與一般中國四合院建築性質相同的合院建築，亦即所謂的「九廳十八院」建築（圖-11）。另外，有與閩西土樓及贛南土圍的防禦設施不同的粵東客家建築，其在基地前配有半圓形水池，後有圍龍屋圍繞，圍龍屋內作有龜甲形稱爲「花胎」的土堆，這類建築被稱爲圍龍屋。（圖-10）雖然各地似乎分佈著不同的建築型態，但不能忽略的是各地都普遍存在中國民居建築的基本合院建築型態。下面就分佈於閩西、粵東、贛南的建築特徵作較爲精確的界定。

1. 福建的土樓與汀州的九廳十八院之合院住宅

福建土樓分佈於兩個地域。其一是以龍岩、永定及南靖爲中心的山區，其西側以連城、長汀或寧化爲隔，連接江西省南部區域範圍，爲客家人主要的居住地域。另一則從古都漳州延伸至廈門，以及接近臺灣海峽的詔安、平和縣的沿海一帶，主要是閩南人居住的區域；他們與客家人擁有相同形式的土樓，其範圍自九龍江上游內地的華安到南邊的廣東省地域。

在客家人居住的閩西山區，其主要的土樓民居有殿堂式的五鳳樓、圓形土樓及方形土樓，從這個區域再往西北方去，明清時代屬於汀州府轄下的長汀、上杭、武平、連城等處，在那裏則不見圓形或方形的土樓，倒是分佈著所謂的九廳十八院爲主之合院住宅。（圖-11、圖-12）這種分佈區域及建築的特性，一方面表示從中原遷來的客家人得以在汀州一帶休養生息，另一方面亦可以理

在前述的拙文〈高雄美濃客家建築遺風所說的漢人建築空間的本質——以化胎與墓塋型土地公為中心〉中，討論了「化胎」的設置、住屋的「太師椅」形式、墓塋型土地公等等形態都與粵東圍龍屋有密切的親緣關係。在2007年至2010年，於桃竹苗地區從事田野調查時，雖然於數量與形式完整性上，臺灣北部客家略遜於南部，但是北部的客家民居、廟宇、墳墓、土地公廟等都同樣具有「化胎」設置則是可以確定的不爭事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解那些無法定居汀州府一帶的客家人，進入嚴峻的山區後，從殿堂式的五鳳樓發展出方形土樓或是圓形土樓的變遷關係。[16]

這種客家土樓在客家建築裡的後發性，也得到自1981年以來即已開始從事福建民居調查的黃漢民之證實。他有見於客家圓形土樓的興建年代較新，又其分佈範圍限定在永定山區，所以是基於地域性的歷史社會環境因素，從原來的殿堂式五鳳樓建築發展成方形土樓，再受到以漳州爲中心的福建東南沿海地域圓形寨堡之影響後，才發展出客家土樓型態。而圓形寨堡是定居於福建的漢人（閩南人），爲抵抗倭寇來襲，將村落移居至漳州地區原有的圓丘之上，於明朝末年創造出具備防禦功能的居住設施。[17]

值得注意的是在閩西的客家土樓區，其實存在土樓與合院建築並存的現象。過去或許因爲大家過度把焦點置於圓形土樓，故忽略了那與土樓同時存在的合院建築形式之祠堂。我們在2009年8月到訪南靖縣書洋鎮上坂寮村，在離三圓、一長圓與一方形的田螺坑土樓聚落外的西南位置，發現合院建築形式的祠堂建築。還有書洋鎮塔下村，存在創建於明宣德元年（1426）至乾隆25年（1760）間的祠堂德遠堂（圖-13），據現場的建築物上的落款，推測現存建築可能是光緒30年（1904）重修後的遺物。令人意外的是，塔下村的圓形土樓之創建年代都比祠堂要晚得多。祠堂非但爲合院建築，且在建築前面有半月形的風水池，建築後方亦有隆起的化胎，讓人連想粵東圍龍屋建築形式。這種同時存在圓形土樓與合院祠堂的村落，塔下村並非特例，在書洋鎮石橋村亦然（圖-14），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其祠堂的興建年代都早於土樓的現象。此外，我們到訪的土樓，其內部的中心建築或中心房間皆被稱爲觀音廳，不祀祖先而祀觀音。例如福建省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高北村的承啓樓、福建省南靖縣石橋村順裕樓等，即使土樓內部有獨立的合院式建築與充裕的空地可作爲祭祀場所，仍在土樓外部興建獨立的祠堂建築，而不在土樓內中心廳堂設置祖堂。

如黃漢民所言，圓形土樓並非是客家人專有，閩南人亦居住在土樓內生活。對照客家圓形土樓在各層都設置前通廊的迴廊，閩南人的建築形式被稱爲單元式土樓，亦即各戶獨立擁有一、二、三樓空間，並設置獨立的樓梯上下連通。這可以福建省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二宜樓爲代表。二宜樓與永定、南靖的客家土樓不同，它的中心廳堂作爲祭祀祖先的祖堂之用，不在土樓外另設獨立祠堂。該地區除了圓形土樓外，普遍存在多數的合院形式住宅樣式，並且合院建築機

16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客家民居の世界》（東京：風土社，2008），頁81。

17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217-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與閩西客家人專作爲祠堂的建築不同。（圖-15）順便一提，閩西的五鳳樓或是長汀縣與連城縣培田村的「九廳十八院」等建築，在中央上堂（上廳）或是中堂（中廳）位置設置爲祭祀祖先的祖堂。就祖堂設置於土樓外的作法而言，南靖一帶的客家人之習慣確實與他人不同。這種居住空間用土樓形式，祠堂建築採用合院建築，並且在閩南人聚落裡存在與五鳳樓同形之合院住宅的現象，到底應該要如何解釋呢？

2. 江西圍屋民居

與閩西的方形、圓形土樓相同具有防衛功能的江西省南部之「土圍」圍屋，是在客家移民進入江西北部後，再沿著貫穿江西省的贛江從北到南定居贛南地區的客家住宅。贛南地區在距廣東邊境約100公里處，在全南、定南、龍南地區興建圍樓作爲防衛自身安全的設施。與閩西成對照關係，雖亦有少數的圓形樓堡，但大都爲方形，周圍圍以「口」字形的「回」、「國」字形的典型圍屋，或在其外部再圍以「口」字形的大型土圍。其次在四角設置高懸的碉堡，減少防衛死角，以保護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整體的建築形態有如漢代出土的塢堡形態明器（圖-16）。

儘管在建築形態上多屬方形土圍，但是隨著移民遷徙的先後，族群融合的情形，當地居民有所謂老圍與新圍的「圍子」建築，位於龍南的關西新圍就是其中最爲典型的江西土圍民居之一，與其連接的老圍，就有如「父子」般的關係。它興建於清嘉慶末年，道光7年（1827）完工，圍主稱徐老四，經營竹木生意發跡後，從老圍分遷到此地興建的居住群。[18]老圍利用小山岡的地形，在其外部圍以樓屋的居住群，彷彿就是圓形的寨堡。在其相鄰的平地上興建的新圍，運用堅固石材，準確地堆砌出高聳的外牆，圍住83.5公尺x92公尺大小的住宅群。（圖-17）圍樓內部保留具有江南風情的庭院，但外部則是四角凸出的砲樓，有如固若金湯的堡壘。[19]

就既有研究的資料來看，如圖-7、圖-8、圖-17所示，江西土圍與永定、南靖一帶土樓的不同之處，除了方形與圓形的差異外，江西土圍尚於圍子內配置規模龐大的院落建築與廣場等設施（圖-18）。如新圍除了中央九開間中軸三進建築外，在兩側分別有三開間、三進的建築。在規模上，似乎比「九廳十八院」的格局還要大。並且中堂作爲祭祀祖先的祖堂，不另外興建祖堂，這與上述的閩西客家土樓不同，而類似於閩西、閩南人在土樓內設置祖堂的作法。贛南客家土圍以合院建築爲居住空間，旁側的樓屋僅作爲防衛設施，與閩西土樓本身

18 黃浩編著，《江西民居》（北京：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頁2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既是居住空間也是防衛設施的土樓似乎有所不同，但是可以明確認爲，贛南土圍仍是以合院建築爲主體，再圍以四周的樓屋而成的形式特質。本文也將在後述其移民的先後關係，可以知道土圍與閩西土樓一樣是客家後發的建築形式，可以推測兩地的客家建築都是爲了防衛上的需要，從合院建築發展出不同的建築特徵來之結果。

3. 廣東的圍龍屋

圍龍屋分佈於以粵東嘉應州爲中心的客家人居住區域，因爲渡臺第一代客家人大都來自此地區，所以圍龍屋與臺灣客家建築似乎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雖然因爲地形、地勢的關係，長期以來江西、福建內地客家人遷徙往海外移民，或從事海外貿易時，都路經廣州、深圳、汕頭、潮州，因此在廣東省境內也確實存在類似福建、江西的住家型態。例如近福建饒平東北部一帶，即有近似福建省圓形或半圓形的土樓住宅，這是受到沿海地區單元式土樓影響的結果。近江西的廣東北部，則有如始興縣滿堂圍、永成保障樓等的塔狀碉樓，類於江西圍屋碉堡。但是畢竟這類的建築與主流的建築形態「圍龍屋」相較之下，算是少數。

典型的「圍龍屋」建築形態，其住家的前面有半圓形的水池，核心部分排列有下堂、中堂、上堂三堂，兩側配有居住用的橫屋，背後有圍龍建築將半圓形龜甲突起狀的化胎圍起來。祭祀祖先牌位於中堂，以中堂作爲整座圍龍屋的祖堂。後有靠山，前有平坦田地，與福建土樓、江西圍屋相比，對外防衛意識薄弱，這似乎意味著在梅州一帶治安良好的歷史社會環境。[20]

因爲橫渡臺灣海峽的第一代客家人大都出身於此地，所以不論是在建築前面的半圓形水池，前後三進規模的配置關係，及建築後側設置化胎的等等作法，都可見到臺灣客家建築與之密切關連。在此以圖-10所示的廣東梅縣白宮鎮富良美村的棣華居爲例，檢視說明圍龍屋的細部。富良美村位於寬廣視野的自然環境中，村民大都是丘姓。祖先從福建汀州府上杭遷徙而來，定居於此約有100年的歷史，棣華居創建於1918年，佔地面積有5,200平方米，建築面積有2,270平方米，樓向東北，背面有小規模的森林圍繞。一般稱這種規模的建築爲「二堂四橫一圍龍」（三堂四橫一圍龍？）形式，前有禾埕與半月池（圖-19）。禾埕的東側有轉頭門，西側有雜物庫，圍屋東側另蓋有家畜小屋與雜物庫。[21]

19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客家民居の世界》，頁84-85。

20 前引書，頁88。

21 前引書，頁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還可以梅縣丙村鎮豐村的仁厚溫公祠爲例說明其配置。據傳其祖宗堂與大門大約是在明嘉靖至萬曆年間（1560-1609），由12世祖溫會川所建，其他則是逐步擴建，最後一圍完工是最近20年的事情。[22]因此推測，仁厚溫公祠創建至今已有400餘年的歷史。爲三堂八橫、三圍的圍龍屋形式。正面有禾埕與半月池，左右兩側各有四橫屋，分爲三段，其間有兩條橫向道路作縱橫的聯繫（圖-20）。[23]

的確，以客家人的居住區域而言，相對於閩西永定、南靖土樓與贛南土圍建築分佈區域，粵東嘉應州府與閩西汀州府屬於社會治安較爲平靜的區域，明顯不需要興建樓屋作爲防衛設施；也如同前述，嘉應州的客家居民的祖籍都來自汀州，因爲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相似性，因此如圖-10典型的粵東圍龍屋形式似乎傳承自圖-11典型的九廳十八院建築形態。雖然對臺灣而言，嘉應州是大多數客家人的故鄉，但以嘉應州及閩西永定、南靖地區而言，汀州府反而成了他們共同的故鄉。或許也因爲如此，如圖-9所示的永定五鳳樓建築，除了前有風水池外，其後側雖無圍屋，但有化胎與簡化之圍龍屋形式的半圓圍牆圍繞。

（三）從客家遷徙贛南與閩西南的時期看土樓建築之興建

從上述於閩西、閩西南及贛南、粵東的建築形態來看，過去雖然以閩西圓形（方形）土樓作爲客家建築之代表，然而非但閩西土樓區也存在更早的合院形態的祠堂與接近合院配置的「五鳳樓」建築，而贛南土圍在四周防衛性的樓屋內部卻配置著大規模的合院建築。從閩西汀州與粵東梅州，普遍存在中國合院建築形式來看，反而顯現防禦性強烈的土樓與土圍建築具有特殊性。在這種觀點背景下，這兩地的建築形態之發展過程就特別引人好奇。首先，我們從這兩地的客家移民背景開始檢討。

自從羅香林指出客家人是中國中原正統的漢人經過多次的南遷定居，從而建構了自古以來的南遷路徑，這個客家人來源說法，即爲相關研究者及客家人自身所熟悉的共識。也就是據傳早在東晉時期，客家人就已進入江西省北部吉安定居；到了南宋末期，因蒙古軍隊的進擊，隨著宋室南遷，客家人定居於福建與廣東一帶，也逐漸逃往山區居住。至明末清初，清朝政府的四川開發，也使元代以來定居福建、廣東的客家人往蜀中發展。當時因爲廣東省臺山、開平、四會地區人口增加，有不少客家人下山找尋耕種地，導致移民前往貴州省、海

22 房學嘉、謝劍著，《圍不住的圍龍屋——記一個客家宗族的復甦》（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頁35。

23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客家民居の世界》，頁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島。鄭成功也招徠了不少客家人移居臺灣。進入清朝統治後，隨著以漳泉閩南人爲主的移民潮，客家人也前來臺灣開墾定居。這時的移民與過去不同，客家人來到平地，快速增加經營工商業者的人數，他們幾乎佔據了廣東汕頭的工商業。[24]

儘管巨觀上的描述，讓我們知道客家人在唐朝末葉已經進入贛西、閩西、閩南、粵北與粵東一帶居住，當元軍擊滅南宋以後，客家人在此地聚族隱居於今日贛南、粵東、閩西地帶。從明末清初到清朝中葉，才又從這個封閉穩定的客家人中心居住地往外遷徙至四川、貴州、海南島、臺灣，甚至分佈至東南亞一帶。但對於分佈著閩西土樓及贛南土圍建築的區域而言，若以今日可考的建築興建年代及文獻分析其移民路徑過程，則有如下的結果。

1. 客家人遷入贛南的時期

關於贛南的客家移民，在黃浩所編著的《江西民居》[25]中，提及今日的贛南客家是明朝中葉以後再從廣東與福建移入的居民。從當時官方與民間的文獻史料都可證明，有一波移民潮從「閩廣遷江西，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黃浩舉定南《李氏火德公總祠李氏史記》記載七十九世奎公生於宋建炎三年己酉歲（1129年），「公元1160年金兵入侵……民不聊生時，即從河南歸德州攜五子孟佑，時年九歲，遷居江西贛州石城渡開基」。又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歲（1181年），八十世公「因金兵入侵……則帶珍、珠二子到寧化石壁開基」。八十一世珠公在宋元兵亂（1226年）時，自己「又不願意放棄在石壁開創45年的基業與田園，故促其子外遷……遷居廣東鎮平縣開基」。又如贛南民宅中心地的龍南縣姓氏考中，稱太原堂王氏祖籍山西太原，於唐昭宗年間（889-904）遷閩，後於明朝遷入本縣；記鄧姓發源於古鄧國（湖北），於宋景定年間（1260-1264）遷粵東，後於明朝遷入；還追溯葉姓發源於古葉道（河南葉縣），也是先遷粵，到明朝又從廣東和平遷入等等的歷史。[26]

黃浩雖然沒有否定在明朝之前，客家人已經遷居贛南，但是「今天在贛南客家地區所看到的歷史遺跡（包括圍屋在內），很大程度是近五百年主要來自汀、梅兩江流域的移民『再創造』的傑作」。黃浩進一步說明贛南圍屋的出現是當地原住民「土著」、「棚民」與「新客」、「老客」等不同人群所構成的地方社會利害衝突關係的結果。也就是說，先行移入的「老客」已經與原住民融合，達成和平共處的狀態，但在明朝以後進來的「新客」只好往山區挺進，

24 高木桂蔵，《客家－中国の内なる異邦人》（東京：講談社，1991），頁64-72。
25 黃浩編著，《江西民居》，頁204-206。
26 前引書，頁2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了自身的安全，因而興建了防衛性格強烈的「圍屋」建築作爲保護措施。[27]

2. 客家人遷入閩西山區的時期

我們雖不清楚客家人遷入閩西的詳細年代，但從閩西與閩南的土樓興建及發展的先後順序，對思考臺灣客家建築原型或有間接性的幫助。黃漢民在著書《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中，提到「福建圓樓的根在漳州」。（圖-21）黃氏從1981年以來持續對福建建築作全面性的調查，根據他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知道客家人的土樓重視族群的整體關係，即設置公共樓梯與每層的公用前通廊或後通廊，形成所謂的「內通廊式佈局」；閩南人的圓形土樓則重視各戶獨立的門戶與專屬樓梯，形成所謂的「單元式佈局」。而兩者在外觀上幾乎沒有任何差異。

黃氏發現有明確紀年者都是閩南人居住的土樓，如目前所發現最早的土樓，是在「嘉靖戊午年（1558）季冬吉立」的漳浦縣綏安鎮馬坑村一德樓。另外，據《漳浦文化志》所載，現存62棟土樓和土樓遺址裡，有門額石匾落款、碑刻資料可爲據者，明清紀年者有33棟，建於明代者有5棟：一德樓建於嘉靖37年（1558），貽燕樓建於嘉靖39年，慶雲樓建於隆慶3年（1569），晏海樓建於萬曆13年（1585），完璧樓建於萬曆38年）；建於清代者有28棟：即康熙年間者1棟，乾隆年間者22棟，嘉慶年間者3棟，道光、光緒年間各1棟。儘管閩南人的土樓有不少留有紀年的建築，但是永定客家人土樓若非晚於閩南人的土樓，就是缺乏明確的紀年。因此可以推斷漳州閩南人土樓的出現比永定客家人土樓要早。[28]黃漢民氏引用明萬曆癸酉年（1573）所修的《漳州府志》有如下的記載：

> 「漳州土堡舊時尚少，惟巡檢司及人煙輳集去處設有土城。嘉靖四十（1561）等年以來，各處盜賊生發，民間團築土圍、土樓日眾，沿海各地尤多。具列於後：尤溪縣土城二，土樓十八，土圍六，土寨一。漳浦縣巡檢司土城五，土堡十五。詔安縣巡檢司土城三，土堡二。海澄縣巡檢司土城三，土堡九，土樓三」。

黃氏繼續引用清顧炎武（1613-1683）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收錄之明嘉靖44年漳籍進士、翰林院編修林偕春所著《兵防總論》，以及崇禎《海澄縣志》記載之明嘉靖35年進士黃文豪的《詠土樓》，顯示出漳州府所有的土樓皆有相當

27 前引書，頁205-206。

28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頁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歷史。[29]

他還指出現存最古的圓形土樓——沙建鎮岱山村橢圓形的齊雲樓——屬於閩南單元式平面配置，樓門石刻紀年爲「大明萬曆十八年（1590），大清同治丁卯年吉旦」，族譜更明確記載此樓爲郭姓在「明洪武四年大造（1371）」。這是閩西最古老的圓形土樓。雖然黃漢民根據現存閩南人土樓較爲古老的事實，推論客家人土樓學自閩南人未必全是真，但他的看法是目前較爲可信的推論，本文採用他的說法。[30]

在此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就是贛南的「土圍」與閩西的「土樓」都是明代以後才發展出來的建築形式，在時間上比左右對稱、排列於中軸線上的合院建築要晚。並且與渡臺開墾的先民之祖籍地沒有密切關連。也無怪乎臺灣不存在類似土圍、土樓之類的建築。

（四）討論

在本文前言部分曾經質疑，爲何自稱自古保持中國漢人文化的客家人捨去合院建築明確的長幼尊卑、倫理秩序的合院建築，而採用了所有房間都均質排列的圓形土樓。經過上述的分析與追蹤，或許可以給我們些許的啓示。

如福建南靖縣書洋鎮塔下村的例子，其實是採取居住與祖先祭祀分離的辦法，亦即作爲居住與防衛空間的圓形土樓，以及作爲祖先祭祀的張氏家祠德遠堂。這個祭祀祖先的祠堂不但興建年代早於土樓，而且還維持中國自古以來，具有嚴格秩序的合院建築形態。祠堂的建築形式與粵東圍龍屋、閩西汀州的九廳十八院及閩西南永定的五鳳樓建築具有極爲相似的作法（暫時以「圍龍屋形式」稱之），亦即在建築前方有半月形風水池與後方有高壟的化胎。

若黃浩與黃漢民對贛南土圍與閩西客家土樓的研究可信，那麼這些防禦性強烈的居住建築之興建年代是在明代或以後，可知這個「圍龍屋形式」的建築似乎是客家建築共通的基本形式。進一步推論，因爲永定五鳳樓與分佈於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閩南人合院建築形態一致。與南靖一帶的客家村落不同，大地村雖有幾處圓形與方形土樓，但是其他大多數的建築都屬縮小簡化版的五鳳樓建築形式。因此有了大地村閩南人建築的案例，可據以理解建築形式的採用習

29 前引書，頁223-224。

30 有學者指稱位於南靖書洋鎮下坂寮村純客家人聚落裡的「裕昌樓」，其興建年代在元代的至大元年（1308）或是元末明初（1368），但黃漢民稱其興建於明末清初（前引書，頁120）。黃氏在論述土樓興建年代時，強調坊間推論土樓興建年代常根據族譜，推算「傳了多少代」的紀年，但大都不可相信（前引書，頁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慣，並無客家人與閩南人的不同，若再加上贛南客家建築由四面樓屋所圍繞的合院建築的類型，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暫時性的結論，亦即雖然臺灣的客家建築與粵東圍龍屋有「血緣直系」的關係，但是這個圍龍屋形式之原型其實類似閩西、粵東與贛南各地普遍存在的合院建築，而土樓與土圍僅是後代發展出來的特殊形式。

三、臺灣客家建築的特質

（一）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的共通性

承前所述，前言裡曾提及當今臺灣客家建築之研究面臨如何區分其與閩南建築之間的差異問題，但是本文行文至此卻有反其道之勢，證明了中國原鄉各地建築隱然存在所謂的合院建築之共通性。進一步，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的區別，如同永定五鳳樓與華安的閩南人合院建築同型，甚至可以說明其間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黃漢民曾經比較過客家建築的「五鳳樓」的「三堂兩橫式」佈局（圖-22）與閩南「護厝式」[31]民居。他雖然舉建於清末光緒年間的泉州楊阿苗宅「兩進兩外護龍」（臺灣稱法）爲例說明（圖-23、圖-24），但也提及閩南傳統民居亦存在規模較大如永定大夫第「五鳳樓」，中軸線上三進，兩側多排護厝並列的建築。雖然各自在規模大小、建築樓層高低錯落的安排、前後半月池與化胎的有無等的形式上各有特色，但是兩者其實存在清楚的「親緣關係」[32]：

31 「護厝式」民居是中國福建對於典型閩南建築格局的稱法，在臺灣可以用「三合院」或「四合院」住宅稱之；「護厝」兩字應該等同於「護龍」。這一段文字用黃漢民的稱法，但可以等同視為臺灣的「三合院」、「四合院」一般稱法。

32 有學者指出五鳳樓的空間平面配置，存在所謂的「一明兩暗」與橫屋多設側廳的作法，不見於泉州楊阿苗宅的內部空間配置，因此懷疑各自有不同的源流的問題。這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看法。作者曾在2010年12月，由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主辦的「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過以〈關於台灣北部客家建築內部廊道發生之思考〉為題的文章。雖然文中所論有待討論的空間不少，但文中懷疑五鳳樓的平面配置與北方漢人的住宅平面配置存在某種關係。另外，關於民居與家祠空間的差異性等等關係，作者曾在〈漢人の「宗族倫理風水観」からみた台湾の伝統的民家〉（收錄於玉井哲雄編，《歴博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08　アジア比較建築文化史の構築——東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堂兩橫式的客家五鳳樓與閩南護厝式民居在平面佈局上十分相似：都是中軸對稱，以兩三進合院為中心，兩側或『橫屋』或『護厝』，都是縱向組合的連排式建築，呈左右烘托之勢，佈局嚴謹、主次分明。

其中心合院是中國傳統的佈局形式，無疑是客家人或閩南人南遷時帶來的北方四合院的形式。但是兩側的橫屋、護厝的處理則是定居閩粵地區後新的發展。北方四合院雖然也有跨院的形式，但是多為輔助用房，閩東、閩北也有在縱向多進的四合院，一側建書院或花廳，也只用作書房或待客的場所。

而護厝或橫屋則主要是居住空間，護厝或橫屋中的臥室均面向中心合院，並不是朝南。因為在閩南沿海濕熱的夏季，居室並不歡迎甚熱的穿堂風，更希望得到陰涼的環境，這種面對窄天井的縱列佈局，正好滿足了這個要求，這是適應這個地區氣候特點的產物。[33]

如同前文所述，閩西的五鳳樓其實與華安縣的閩南村落的合院住宅，雖然在規模上有大小之分，但在形式上卻是屬同型建築。這些建築形態與汀州培田村的客家建築之九廳十八院（圖-11）及粵東的圍龍屋（圖-19、圖-20）都有相同的居住空間營塑的秩序與建築配置關係。若將後來發展的閩西土樓與贛南土圍除外，黃漢民比較永定客家建築五鳳樓與泉州楊阿苗宅，可以視爲整體閩南建築與客家建築之間基本形態之比較。而臺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的傳統習俗當然傳自中國原鄉，因此其亦可視爲臺灣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形態（圖-25）的異同關係。

因此臺灣客家建築繼承了中國原鄉粵東圍龍屋的建築形態，而典型的粵東建築雖沒有如五鳳樓的四、五層或兩、三層之建築，但是確實是「三堂兩橫式」的合院建築與五鳳樓幾乎採相同的平面配置。如前所述，過去常被視爲客家建築代表的閩西南靖一帶的土樓，因爲它們是明代以後才發展成熟的建築形態，其與客家人定居於江西、福建與廣東的歷史相比，明顯是新的建築形式，與其說它是客家建築的特色，不如說那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前文也指出，即使在閩西一帶土樓密集區也存在合院住宅，或是合院祠堂的建築形式。如前述的田

ジアからアジアへ——報告書》，日本千葉縣佐倉市：國立歷史博物館，頁37-55）中作過詳細的討論。希望讀者可以一併參閱之。

33 黃漢民，《客家土樓民居》（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頁92-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螺坑黃氏祠堂、書洋鎮下坂寮村劉氏祠堂追繼堂（一堂二橫）[34]、書洋鎮塔下村張氏家祠德遠堂（二堂二橫；圖-26）、書洋鎮上雙峰村水頭邱氏祠堂雙溪祠（一堂二橫）、書洋鎮下雙峰村邱氏祠堂追遠堂（二堂二橫）、書洋鎮石橋村張氏祠堂追遠堂（二堂），以及永定縣高陂鎮三槐堂（三堂二橫）與裕隆樓大夫第（三堂二橫）等建築。

在中國住宅研究的最早期，亦即劉敦楨進行了全國整體性的調查後，終於在50年代後半付梓出書的《中國住宅概說》[35]，該書曾對廣東圍龍屋做過建築類型的分類。（圖-27）從這些配置圖裡，不難發現其最基本的形式是「三堂」或是「三堂二橫」。三堂是排列於中軸線上的下堂、中堂與上堂的三棟堂屋，在堂屋之間有天井，天井兩側有通路或是廊屋，將堂屋前後連結在一起。有如「日」字形的配置。[36]

大門通常就作爲下堂屋（門廳），於下堂屋靠近天井一邊設置有屏門，這是爲了遮擋從外部來的視線，使外來者無法直接透視內部空間。平時的出入繞過屏門兩側進出，只有在特殊的節日，才拆下屏門的門板，可直入中庭到中堂。中堂屋與下堂屋同樣都是三開間的規模，中間一室稱爲中堂。中堂亦稱正堂，是全體住宅的中心，其兩側的房間稱爲東、西客（花）廳，中堂的背面亦設有屏門。在永定縣高陂鎮的大夫第，稱四層樓高的後樓（主樓）爲上堂屋。一樓中央房間爲門廳，設置樓梯通往上層，亦作爲倉庫貯藏空間。兩側的房間大都作爲臥室。一般主樓的窗戶小，出入只有一個門，其主樓牆壁作得厚重又堅固的土樓建築形式。[37]

同樣的若以大夫第爲例說明左右夾住三堂屋的二橫屋，其橫屋高低不一，通常採取階梯狀。最前面爲一層樓，後部甚至高至三、四層樓。平面細長，分割成多數獨立的房間，大約有11～12個房間。橫屋與三堂屋間的天井稱爲橫坪。細長的橫坪，大約與橫屋同長，可從其前端的小門進出內外，後端與主樓聯繫，配置有進出後面的涼院。[38]

不論是客家與否，在臺灣的建築裡與此三堂兩橫最爲接近的平面配置要算

34 （）內對建築規模與配置形態的稱法是仿照下述的劉敦楨《中國住宅概說》所整理的規則，以下皆同。

35 劉敦楨著，《中國住宅概說》（北京 ： 建築工程出版社），1957。

36 東京芸術大学中国住居研究グループ（茂木計一郎代表），《中国民居の空間を探る》（東京：（有）建築思潮研究所，1991），頁159。

37 前引書，頁159-160。

38 前引書，頁1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規模較大的民宅，板橋林家三落大厝（圖-28），因爲具備第一進（下堂）、第二進（中堂）與第三進（上堂）的規模，其外護龍部份可稱爲「兩橫屋」。但是臺灣普遍存在的三合院建築，通常與大型民宅的板橋林家三落大厝不同，不設下堂的門廳，並且左右內護龍的機能不單只是過廊，而是作爲居住使用的空間，因此存在模擬兩可，機能不清楚的情形。

另外，如屏東縣佳冬蕭宅，目前雖爲前後五進的大規模客家建築建築，但似乎前後兩進是後來加建，因此原本就有建築仍視爲類似「三堂兩橫式」住宅。（圖-29）從泉州亭店楊阿苗宅、以泉州安溪爲祖籍的林安泰宅、以漳州龍溪爲祖籍的板橋林家三落大厝以及以廣東梅縣祖籍的屏東縣佳冬鄉蕭宅，如圖-10、圖-19、圖-20所示的廣東梅縣白宮鎮棣華居與丙村鎮豐村的仁厚公祠的中央三落之三堂，到福建省永定縣的大夫第五鳳樓及南靖縣書洋鎮各家祠建築，無論是客家建築或是閩南建築，若暫置在建築前後是否有半月風水池與化胎，其建築規模都可用劉敦楨所整理的廣東圍龍屋之建築類型來歸類。

（二）客家建築在臺灣的轉化

1. 臺灣客家建築的規模表示

雖然臺灣的大型傳統住宅無關乎客家、泉州與漳州之分別，都可以用類似廣東圍龍屋的「三堂兩橫」爲基本型的規模表示。若規模大者，其護龍多幾列，就以「三堂四橫」表示，以此類推可表示同類型之建築之規模大小。但是臺灣的傳統建築通常沒有下堂的門廳，並且僅有一落者多。如2003年鍾心怡建築師在新竹縣所作的傳統建築之普查[39]，在報告書中舉出80個較爲詳細的案例中，僅有4個案例屬於四合院的格局。僅由正身與左、右護龍組成，沒有外護龍的單純三合院者有24個，佔有30%。這些都說明臺灣的傳統建築以三合院爲主流的現象。

還有，雖然板橋林家三落大厝及佳冬蕭宅中央三堂前後聯繫的設施（左右廂房位置）作成圍牆或是轎廳空間（圖-30），這類似永定大夫第五鳳樓（圖-22）下堂與中堂間的廂房位置作爲公共客廳使用；但是如林安泰或是一般規模較小的三合院，不論其內護龍或是外護龍，都作爲私密性高的居住空間之臥房使用；因此臺灣的建築，特別是客家建築，無法直接採用劉敦楨所歸納的「△堂△橫」的方式表達。即使在中國，那可被視爲客家建築的裕隆樓大夫第的簡化縮小版，

39 鍾心怡主持，《新竹縣傳統聚落與傳統建築調查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3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位於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的大量閩南人住宅。（圖-15）該建築由一樓的門廳前堂與隔著中庭的二樓後堂，前後堂排列以中軸對稱，組成或可稱爲「二堂」式的建築。但在中庭兩側廂房處的建築，作成二層樓的倉庫或是具有附屬性功能的次要建築。通常若以大夫第爲代表的「三堂兩橫式」住宅，其「橫屋」處才是私人居住的臥室，被指稱爲「三堂」的部分，通常作爲公共空間使用。

大地村的住宅建築與臺灣的三合院相同，其左右廂房（內護龍）公私機能混淆的現象，該建築可以類比爲臺灣的四合院建築。大地村的住宅，前堂爲一樓，後堂爲二樓，符合圍龍屋前低後高的建築尊卑秩序。在本文暫稱它們爲「四合院」式建築。前述稱下坂寮村劉氏祠堂追繼堂爲「一堂二橫」式的建築配置，它屬於較爲特殊的形態，因爲其中的「一堂」是指中央的三合院加單開間門廳的作法。之所以稱上雙峰村水頭邱氏祠堂雙溪祠爲「一堂二橫」，其中的「一堂」是指單棟的歇山頂正堂，左右兩旁各配置一條橫屋。若依此推論，「一堂」可以理解爲「三合院」建築，「兩堂」則可以解釋爲「四合院」建築，而「三堂」則是「三進的合院建築」。

根據田野調查經驗，臺灣三合院建築數量佔有絕對多數，並且高雄縣美濃地區住宅，其兩側的內護龍向前延伸而顯得特別長，這種現象不見於閩西、粵東。鍾心怡用「堂」與「橫」的概念表達建築規模與形態，如分別用「一堂二橫」、「一堂四橫」、「二堂二橫」等來表達在「三合院」、「三合院＋左右外護龍」與「四合院」的建築格局。但是在中國似乎只有把外護龍才稱爲「橫」，而臺灣農宅通常不設下堂的門廳，顯現出兩地合院建築的差異性。因爲臺灣護龍建築機能的混淆，難怪鍾氏在指稱其規模時顯得相當勉強。

《新竹縣傳統聚落與傳統建築調查研究》中編排爲Ⅱ-86頁的新埔鎮中正路陳氏宗祠德星堂和編排爲Ⅱ-270頁的北埔姜氏家廟，雖然都被歸類爲「二堂二橫」（臺灣一般稱爲「四合院」），但是其與被稱爲「二堂二橫」的中國福建塔下村張氏家祠德遠堂（圖-26）就有相當大的不同。儘管都是由門廳下堂與正堂組成「二堂」格局，但德遠堂左右有橫坪的天井，因此可以是「二堂二橫」；前兩者僅能算是德遠堂的「二堂」部份。並且若在福建則稱類似新埔德星堂與北埔姜氏家廟的格局爲「二堂」，如福建書洋鎮石橋村張氏祠堂追遠堂（圖-14），三者的格局幾乎一致，或許直接將其歸類爲「二堂」類型較爲清楚。又編號Ⅱ-89被稱爲「一堂」的新埔范屋高平堂，其實就是過去我們所熟悉的「一條龍」的建築格局。綜合上述，單純的「三合院」建築，若以中國福建廣東地區的稱法，則將被歸類爲「一堂」，但這無法表達臺灣建築的特性，因此仍以「三合院」稱之較爲恰當，若有「外護龍」則以「橫屋」稱之。

如此一來，可以將鍾氏的建築規模一項的內容改爲「一條龍」、「三合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合院＋1橫」、「三合院＋2橫」……「二進三合院」、「二進三合院＋2橫」至「三進三合院」、「三進三合院＋2橫」……如此依序表示建築的規模。另一方面若不是三合院格局，如板橋林家三落大厝（圖-28）則可以按劉敦楨對廣東圍龍屋的建築類型分類（圖-27）來指稱，亦即與福建高陂大夫第裕隆樓相同，可用「三堂二橫」或是「三落二橫」的方式來表示。雖然原本存在臺灣傳統舊有稱法的正身、內護龍、外護龍及「落」等專有名詞，但若考量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來自粵東，進行與廣東住宅建築之比較研究時，而更改其規模的表示方式，或可有在此討論的表示方式（表一）。

2. 臺灣客家建築的紅磚化

前言曾提及在中國的客家原鄉不存在紅塼建築，但是在臺灣不論南北客家建築都使用紅塼砌牆，並且是正式的客家建築作法。例如新竹縣北埔鄉金廣福會館，若曾在1999年以前參訪過該建築的人，對其建築立面使用石灰塗抹的白牆必然印象深刻，該建築的外觀也曾被視爲判定是客家建築與否的準則之一。但在進行921地震災後修復工程時，它卻被指出在1935年大地震發生前，其牆面原來採用了閩南紅塼斗字砌的工法。可見臺灣客家建築非但在型態上，甚至建築材料的使用上也與閩南建築一致。問題是原鄉的粵東圍龍屋及潮州建築幾乎不用紅塼，但就如金廣福所呈顯的歷史事實，臺灣的客家建築在很早的時候即已開始採用紅塼爲外牆的作法。

爲何臺灣與中國原鄉不同，偏好採用閩南紅塼建築的樣式風格呢？這恐怕是因爲要取得原鄉的建築材料困難所致。根據陳信雄的《磚瓦之美》[40]，知道臺灣之有塼起自荷人據臺，當時甚至雇用中國工匠來臺灣燒塼，但不知原因爲何，隨著荷人退出臺灣，製塼的技術也隨之消失。從歷史文獻記載，雖然知道明鄭的陳永華曾「教匠取土燒瓦」[41]，但即使到了道光年間興築淡水廳城時，仍然嫌棄「本處土磚質鬆易碎，必須由內地定燒，運回應用」[42]，直至光緒8年（1882）興建臺北城才見使用臺灣本地所燒的塊塼。

根據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清代臺灣的製塼技術不佳，即使燒出塼來也無法作爲建材使用。然而清代臺灣卻出現大量的紅塼建築，其塼從何而來？答案是運自對岸的廈門者居多。如從中國船運貨物到臺灣的記載中，「到臺貨物，如三號鴉片、布匹、呢羽、麻袋、粗棉花、紫花布、扣布、生烟、鋼、鐵、紅

40 陳信雄，《磚瓦之美》（臺南：六甲鄉公所，1997）。

41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235。

4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署北路淡水同知稟〉，《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第171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頁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磚等項；由廈門運往者多，由上海、寧波、香港者少」。[43]在建造臺灣縣城時，「即欲商建造，而磚石之屬，皆取資於內地，工力又數倍焉。非縻數十萬之金，不足以充費」[44]，以及「奈該處磚瓦木料各項，均須購自內地，採運維艱。雖報興工，料不應手」[45]，這些文獻都說明建造城牆的塼塊要自廈門運來的情形。用於興造住宅的紅塼，其品質要求更高，當時的臺灣是無法燒製的。若要沿用原鄉的青塼，則必須從位處中國內陸的故鄉載運而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無怪乎較爲華麗的臺灣客家建築都採用了閩南紅塼砌造。

進入日治時期以後，隨著日本國內的西化與近代化，日本人鮫島盛也於明治28（1895）年在臺北圓山設置紅塼製造廠，於六館街設立「鮫島商行」，以因應臺灣開始興建新古典樣式紅塼建築之需。「鮫島商行」也就是後來「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的前身[46]。「1899年（明治32年）臺灣縱貫鐵路開始鋪設時，鮫島商行不但經營煉瓦事業，亦提供木材及石材給鐵道局」[47]。透過供應鐵道建材，鮫島才在臺灣得到快速的發展。「隨著鐵路建設的延長，需要大量的建材，因此鮫島商行也從日本引進新技術來滿足鐵道局的需求」[48]。於1900年（明治33年），在圓山工廠蓋了日本登窯（臺灣稱爲目仔窯），雖然紅塼產量因此得到增加，但還是無法滿足所需。於1903年（明治36年），引進新式的機械製造技術，並且在全臺各地設立新式的煉瓦紅磚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紅塼製造廠的設立與新技術的導入，並沒有讓臺灣的紅塼製造廠萎縮，臺灣人的塼廠自發性地學習日本目仔窯技術而有新的發展。一方面因爲幾乎所有的臺灣建築都需要紅塼建材之外，如同中川理指出「在關東大地震後日本大幅減少紅磚造建築，但是在昭和10年（1935）臺灣中部發生受災嚴重的地震時，儘管日本國內召開了『震災預防評議會』，關心如何改善

4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論臺灣府城及打狗地方通商馬頭貨額〉，《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文獻叢刊第46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50。

44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69。

45 （清）劉璈，〈稟覆統籌臺防大致情形由〉，《巡臺退思錄》，臺灣文獻叢刊 第104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255。

46 中川理江，《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27。

47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10），頁96、頁101。

48 中川理江，《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為例》，頁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家屋結構耐震問題，但是焦點僅置於小學等公共建築上，一般的民宅沒有在討論的議題之中。因爲土坯材被明文禁止，臺灣人只好自主性尋求較爲安全的紅磚材，因此與日本國內的發展趨勢相反，紅磚的需求不減反增」[49]。也就是說在昭和10年的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地區就集中於苗栗縣客家人聚集地區，因此造成客家人的紅塼建築更爲普遍，數量更多的結果。

（三）客家建築裡的古代中國建築作法之遺風

同樣在前文中亦已提及正身明間的中脊木用雙重棟木（簡稱爲「雙棟」）的作法，近年來被用來判定是否爲客家建築的準則之一。但是在原鄉的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另外，客家文化一直都被視爲古老的漢文化而被忠實地保存下來，那麼今日的客家建築是否保有古老的中國建築文化的特徵呢？

1. 雙棟

臺灣建築史學界指出客家建築採用雙棟的作法已有近20年的歷史，但是僅重視其在民俗傳說上的意義。其中之一種說法可以引財團法人六堆文教基金會所撰編的《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建築篇》加以說明。亦即在客家民居中作爲祭祀祖先廳堂的「廳下」，於其屋頂結構的脊檁（棟木）[50]下，多設一根沒有結構意義的假脊檁。根據匠師的訪談，認爲客家人重視敬天祭祖，使「廳下」中脊檁、燈梁與門楣連成一條線，直線以上的空間視爲神鬼界，以下視爲人界，開門之幅度不可以觸及燈梁投影下來的投影線，在顧及屋頂高度與禁忌情形下，以雙棟作法配合這種民俗舊慣的要求條件。這種作法多見於美濃地區，美濃匠師也強調棟木要突出（次間）的牆面，以表示生男孩的「出丁」意義（圖-31）。[51]

在此無法判定雙棟是否僅屬客家人的舊慣，但是確實在中國粵東地區的客家建築，如梅縣嘉應州大學內的留餘堂、梅縣松口鎮銅盤村下店的世德堂、源遠樓，還有前述的丙村溫氏公祠，以及位於梅縣與潮州之間的豐順鎮建橋縣建橋圍的傳統住宅中，普遍存在雙棟的作法。同樣地，也可見於被視爲梅縣客家人祖籍地的福建省長汀縣，在縣城的南大街之諸氏宅園建築（賴氏坦園祠等）及連城縣培田村劉氏祠堂追繼堂。在我到訪過的客家聚居地區的建築皆存有雙

49 前引書，頁84-85。

50 原文用「脊梁」，可以視為本文所稱的「棟木」，圖-31內所示的「雙主梁」可視為本文所用的「雙棟木」。

51 陳淑玲、賴福林，，《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第十二篇 建築篇》（屏東：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頁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棟作法，這似乎表示上述的命題是真的。

問題是非客家人的建築又是如何？位於閩西土樓密集區其南靖縣塔下村張氏家祠德遠堂、下雙峰村追遠堂等建築不作雙棟，但與下雙峰村相鄰的上雙峰村水頭雙溪祠，以及具客家代表性建築之高陂裕隆樓大夫第則有雙棟作法。值得注意的是，華安縣二宜樓雖屬閩南人興建的住宅，卻採用雙棟作法。也就是說，雙棟在閩西並不限定爲客家建築才有的作法。顯然這個命題在中國是否爲真還有待檢驗。

針對這種雙棟作法，宜檢視江西的建築結構。雖然作者尚未到訪過江西，但在黃浩所編著的《江西民居》中，提及不少與雙棟或是雙層屋頂有密切相關的案例。就該書所舉的案例中，可以判定採雙棟作法的有如下幾棟建築：江西省東北上饒市的波陽縣茶條巷3號（前書頁59）、同位於波陽縣的江家山村村委會（同頁62）（圖-32、圖-33）、波陽縣建設路20號（同頁70）、波陽縣油墩街鄉計家村計省智宅（同頁72）、江西東北上饒市附近的鉛山縣石塘鄉下街祝宅（同頁76）、江西省北部鄱陽湖北岸的都昌縣大樹鄉風火陳村祖廳（同頁79）、江西省西北部的萬載黃茅鄉湯家農舍（同頁82）、江西省西北宜春市銅鼓縣排埠鄉新華村虎形新屋（同頁88）。從上述這些例子，可以知道江西省北部非但普遍存在雙棟，甚至整體的屋頂結構的檁桁木都採雙重作法。

也就是位於江西省大部分的案例及福建省長汀縣賴氏坦園祠，或是培田村吳氏祠堂追繼堂等案例，不只在中脊棟木部份，於其支撐屋頂荷重的所有檁桁木都使用雙重作法。可見這與如前述臺灣六堆地區的民俗舊慣之意義很不相同，應該屬於結構上的問題。根據上面的觀察，或可推論臺灣存在的雙棟作法應是這種結構作法的遺風。關於江西省雙重桁檁結構作法，黃浩在《江西民居》裡有綜合性的論述。在江西稱這種典型結構爲「五柱九檁構架」[52]（圖-34、圖-35）。在進深方向立5柱，各柱間再增立一童柱，成爲9檁架構。一般的架構再加上前面的檐柱，進深可達6至7公尺左右。一般在檁桁下穿過4層相疊的穿枋，以增加架構整體的結構剛度。而廳堂開間左右兩側所立的架構（棟架）主要依賴檁桁木承擔結構的穩定性。當廳堂開間的面闊尺寸較大時，即應用兩根重檁（疊檁），或者檁下增加多層的穿枋。這種作法不但可增強構件的穩定性，還可兼具裝飾的效果。正脊部位除了增加棟木之外，江西許多地區在正棟木兩側增加一對伴枋檁木，組成「三花檁」（圖-36）。

有趣的是，這種「五柱九檁構架」是基於結構的要求發展出來的作法，但是後來如圖-34所示，其支撐屋頂屋脊正中棟木者爲「前大金童柱」，而支撐上

52 「檁」或「桁」是清式稱法，相當於宋式的「槫」與臺灣式的「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槫者則爲「棟柱」。換言之，內部架構之結構秩序可以獨立於上層外部的屋頂，依室內空間之需要而調整頂部的斜率與內部空間的分化。這種類似暗厝之作法可見於長汀縣賴氏坦園祠（圖-37、圖-38），其屋頂結構使用雙棟、雙桁檁（槫）、雙椽，形塑出雙層屋頂結構。這種雙層屋頂的作法似乎在古老的中國就已經存在。田中淡根據中國第一部字書《爾雅》的記載，復原「五架屋」的結構系統（圖-39）。[53]將此復原圖拿來與賴氏坦園祠相比，幾乎如實地表現《爾雅》記載的內容。

進一步言之，這種雙層屋頂作法不僅出現在中國境內，也可發現於受中國建築深遠影響的日本建築。日本的雙層屋頂可見於平安時代初期（8世紀末，9世紀初）的佛教建築上（圖-40）。雖然過去在中國建築史裡，也注意到了園林裡草架屋頂的結構（圖-41），這與日本著重結構力學之意義不同，因此日本學界因此認定雙重屋頂是日本獨自發展出來的作法。亦即，日本建築裡有一根槓桿原理的「桔木」，這是中國建築裡不存在的構件，它的使用可增長屋簷的出簷深度，但又能讓屋頂外觀保持一定的陡峻斜度。因此存在雙層的椽木，其一隱藏在屋頂結構的內部，另一就是室內可以仰望得到的椽木。換言之，其屋頂外觀的斜率與包被在內的椽木斜率可以獨立計算。[54]對於雙層屋頂的出現，日本強調屋簷出挑的深遠，以造就建築外觀的造型，而江西的「五柱九檁構架」或是長汀縣的賴氏坦園祠，似乎將焦點置於室內天花或是空間的裝飾，中日建築的旨趣有些許的不同。

但是無論如何，臺灣的雙棟作法可以溯及粵東的圍龍屋，而圍龍屋可以溯至長汀「九廳十八院」建築，還能進一步追溯至江西「五柱九檁」構架所代表的中國南方穿鬥式結構的特性，也就是雙層屋頂的結構原型。這個原型意外地也在中國古文獻的『爾雅』有類似的記載。

2. 凹字形的圍牆

前文曾提及鍾心怡在新竹縣所作的傳統建築普查，在報告書中舉出80個較爲詳細的案例中，僅有4個案例屬於四合院的格局。換言之，現存傳統建築裡有95%屬於三合院「凹」字型的平面配置。在中國原鄉三合院格局的建築並不顯著，這種現象當然不可避免是歸因於臺灣建築發展的不完全所致，但是2009年在竹苗地區從事田野調查時，非但在建築整體的建築形態，於三合院前方的圍牆亦呈現凹字形式的現象。如苗栗縣頭屋鄉東海堂徐家（1932）、苗栗縣西湖鄉彭城堂（圖-42）、苗栗縣苑裡鎮東里家風（約1900-1924）、苗栗縣苑裡鎮鄭家

53 田中淡，《中國建築史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89），頁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祖厝（約1890-1917）、苗栗縣公館鄉福興鄧家南陽堂（約1935）、苗栗縣公館鄉福興曾家魯國堂（約1935）等處。

在進行客家傳統建築調查中（表一中Ⅰ-1～Ⅰ-30）[55]，雖然沒有特意去尋找凹字形圍牆的民宅，然在30個案例中有8個案例（約佔27%）屬於這種形式。雖不能算是多數，但已經足夠告訴我們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作法，而是具有一定歷史文化意義的圍牆形式，否則不會一而再地重複出現。若加上圍牆是直線但與兩側凸出的護龍，幾乎所調查的建築都屬這種凹字形的平面配置。這到底代表了什麼文化意義呢？

若檢驗中國建築史，呈現「凹」字型配置的建築，明清時代北京故宮紫禁城裡的午門建築是最清楚不過了（圖-43）。這個作爲王朝宮殿正門之午門有中國正統傳統古老的傳統，其可上溯至四川省成都市出土的漢代畫像塼上的闕，亦即屬於門前突出的雙闕（圖-44）。

這個午門之紫禁城正門極具象徵意義，清朝建國之初平定了準、回兩部民之際，皇帝座於午門之上的樓閣，接受其民族的降服。在東漢劉熙的字書《釋名》對這個門闕即有明確的記載，亦即「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56]。所以中國自古代至近世的明清時代有一貫的宮殿正門的傳統。問題是平民住宅的「凹」字形三合院配置與宮殿正門的「凹」字形有何關係？熟悉中國建築的人可以理解民宅與官署、宮廟、寺觀建築存在一貫的空間配置原理，亦即中軸南北排列，左右對稱的空間秩序。中國自古以來，祖先祭祀制度即有《禮記》所規定的制度，也就是「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57]從天子至庶民對於宗廟的祭祀設施之規定，雖有數量規模等級的差異，但其空間的基本想法並無太大的差異，都屬於中國自古以來的昭穆之制。

這種現象在中國建築史學界的代表性學者，從草創時期的19世紀末之伊東

54 太田博太郎，《日本建築史序說》增補新版（東京：彰國社，1988），頁87-88。

55 表一的編號中，雖然有些沒有經過確認，但1-1～1-30都操客家語，所以分類為祖籍客家者；編號2-1～2-7為閩南族群；3-1～3-2則為賽夏族群的住家。

56 《釋名》卷五・釋宮室：「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觀，觀也；於上觀望也。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摟然也。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漢）劉熙，《釋名》，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頁7。

5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義，《禮記註疏》，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2，頁18-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忠太到21世紀的今天中國建築史研究的成熟期之田中淡，他們認爲不論中國建築類型是爲宮殿、衙署、佛教、道觀、文廟、或是一般的住宅，都存在類似的空間配置特色[58]。假如這些中國建築史學者所說的現象是真實並屬有效的言說。那麼在臺灣鄉下小農宅三合院或是圍牆的凹字形形式，其所形塑的正門入口意象就讓人聯想北京故宮的午門凹字形的建築形態。

另外，也讓人聯想唐高宗在長安城的東北角所興建的大明宮正殿的含元殿形態。含元殿正對其南方的丹鳳門，乃宮殿的前朝正殿，同時又兼具備有宮城門闕的性格，全體成凹字形形式。它是建於巨大的3層基壇上的大型建築，大殿前方左右對稱配置有翔鸞閣與棲鳳閣，組成整體的雄偉建築。含元殿左右有通乾門與觀象門（或許可以聯想客家夥房廳下往次間的通道門，通常是龍飛門與鳳舞門），用廊道聯繫其兩端的鐘樓與鼓樓，再用飛閣廊道向前伸展，前端就是翔鸞閣與棲鳳閣。如此的造型，以大殿爲中心，配以東西兩樓，以及前方的東西兩閣，由五棟建築組成或許偶然與永定五鳳樓同名之「五鳳樓」具有相同的凹字形平面。（圖-45）含元殿的造型其實是根據古代宮城門的「門觀」或是「門闕」的門樓形式，也是與現存明、清北京的紫禁城之午門同樣的建築形態。[59]（圖-46）

基於上述的想法，位處中國海外的客家農宅的建築基本配置相通於唐代大明宮的含元殿與明清北京故宮紫禁城的午門的凹字形的配置，應該不是完全屬於無稽之談的言說。

四、結論

在本文撰寫之初僅抱持一個樸質的疑問，到底要如何區隔臺灣客家人與閩南人建築的特徵，但是文章論述逐漸追尋下去之後，卻得到相反的結果。亦即，從與臺灣客家人建築有親緣關係的粵東圍龍屋式建築，以及與粵東客家人的原鄉福建汀州的九廳十八院之間，或是從汀州移民至閩西南的永定之五鳳樓大夫第建築之間，甚至與土樓密集的聚落裡的祠堂建築之間，其實存在建築樣式、空間配置使用、對建築的宇宙觀等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一貫之關係存在。

從閩西南土樓及贛南土圍建築研究的先驅者黃漢民與黃浩之討論，讓我們

58 伊東忠太，《東洋建築史の研究》上（東京：龍吟社，1936），頁115。田中淡，〈建築〉，收錄於陳舜臣、尾崎秀樹監修，《『中国』世界の歴史と文化》（東京：新潮社，1993），頁203。

59 田中淡，〈隋・唐時代の建築〉，收錄於《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第四冊（東京：小學館，2001），頁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道一向被視爲客家建築的代表之圓形（方形）土樓及贛南的土圍建築，都是明代以後才發展出來的新建築形式。從實地的現場調查，亦可以發現土樓僅是客家人的居住場所，而客家人所重視的祖先崇拜的祠堂建築卻在土樓之外，不但其建築形式維持與其他地區客家建築相同的特徵，其興建年代亦比土樓建築來得早。所以土樓實是客家人新發展出來建築形態，屬於客家建築的特例。

本文除了借用黃漢民比較永定五鳳樓「三堂兩橫」式建築與泉州楊阿苗宅的結果，進一步檢討了臺灣的傳統大型住宅，不論是漳州祖籍的板橋林本源三落大厝或是泉州祖籍的林安泰宅邸，以及粵東梅州祖籍的屏東佳冬蕭宅之第二、三、四進部分的宅院都與「三堂兩橫」式之間的建築形態、空間配置保有類似性。所以不但在客家移民的遷徙過程的祖籍脈絡關係上有親緣關係，在建築形態上亦屬於共通同類型的建築。

即使包括臺灣與中國原鄉的客家人建築，其與閩南人的合院建築具有親緣的密切關係，但從實際的田野調查，即使如桃園縣大溪鎮的李騰芳宅的大型建築，在建築正面都採用三合院的「凹」字形配置，臺灣的傳統建築就如鍾心怡在新竹縣所做的傳統建築普查結果，幾乎多達95%以上的建築屬於三合院建築形態。並且絕大部分的客家住宅都採用紅塼蓋屋，這與客家原鄉很不相同。從本文對清代歷史文獻的調查，知道建築塼材大多來自閩南的廈門港，所以在臺灣不分閩南人或是客家人的傳統建築呈現出紅塼建築的特色。從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本來所就已具有的共通性基礎上，再加上三合院平面空間的出現與建築外觀的紅塼化等現象，就可以理解爲何在臺灣的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的區分會是如此的困難。

本文也論述了過去近二十年來在臺灣被視爲客家建築特徵的「雙棟」作法，這種說法檢視了廣東省、福建省與江西省的建築後，卻變成了不真的命題。亦即雖然做爲臺灣客家人直接故鄉的粵東圍龍屋普遍存在「雙棟」作法，但在漳平華安的二宜樓閩南人建築竟也出現「雙棟」作法。而這種雙棟作法，很有可能是如長汀九廳十八院，及江西贛北地區「五架九檁構架」穿鬥建築結構系統補強所留下來的雙層屋頂作法的遺風。這種雙層屋頂也共通於《爾雅》對木造建築結構名稱的記載，甚至東傳日本發展出具有「桔木」增加出簷深度的雙層屋頂。進一步，絕大多數分佈於臺灣的客家建築都屬於「凹」字形的空間配置，在中國建築史上，這種「凹」字形建築不但具有特殊的意義，也傳自上古時代的宮殿正門門闕的傳統。還有中國自古以來上自天子以下，諸侯、大夫、士，以至一般的庶民，都擁有共通的建築空間秩序與宇宙觀，從實際的調查研究，也發現不論其建築類型屬於宮殿、衙署、佛教、道觀、文廟、或是一般的住宅，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配置之建築形態。所以認爲臺灣的三合院建築擁有與北京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禁城或是唐朝大明宮大朝正殿含元殿相同的空間配置形態也並非屬完全的無稽之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2009 年後龍溪流域傳統客家建築田野調查表　　圖例：■有□無＊無法進入、未調查

編號	類別	所在與堂號	祖籍	興建年代	建築規模	雙棟	燈樑	土地龍神	前埕天官爐	化胎	床			禾埕			灶下			
											紅眠床	塌塌米	大眠床	門樓	植栽	圍牆	位置	灶	煙囪	灶君爺
1-1	I	竹北六家林家忠孝堂	廣東	1973	三合院	□	■	■	□	□	□	□	■	□	□	■線型	□	□	□	□
1-2		苗栗謝家祠堂	梅縣	1933	二堂二橫	□	□	■	□	■	□	□	□	□	□	■線型	東北	傳統灶	室內	□
1-3	A	苗栗湯家祠堂	梅縣	1788創建1924、1991重修	三合院	■	■	□	□	■	＊	＊	＊	□	■	■凹型	＊	＊	＊	＊
1-4	B	苗栗賴家西川堂	饒平	1933	三合院	■	■	■	□	□	■	＊	＊	□	□	■線型	東北	瓦斯灶	□	□
1-5	B	後龍巫校長家	＊	＊	三合院	■	□	□	□	□	＊	＊	＊	□	■	■線型	東北	傳統灶	室外	□
1-6	B	公館福興林家西河堂	＊	＊	一條龍	＊	＊	□	□	□	□	＊	＊	□	■	□	西北	瓦斯灶	□	□
1-7	C	公館福興曾家魯國堂	＊	＊	三合院	■	■	■	■	□	■	＊	＊	□	□	■凹型	西北	瓦斯灶	□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	B	公館石墻李家隴西堂	*	*	三合院*	□	■	■	■	□	■	*	*	■	■	□	西北	傳統灶瓦斯灶	室內	□
1-9	D	公館石墻鄧家南陽堂	陸豐	1959	一條龍	□	□	□	□	□	*	*	*	□	□	□	西北	瓦斯灶	□	■
1-10	D	公館福興鄧家南陽堂	陸豐	1935	三合院＋一橫	■	■	■	■	□	■	□	■	■	■	■ 凹型	西北西南	傳統灶	室內	□
1-11	B	公館館東林家西河堂	饒平	1935	三合院	■	■	■	■	■	■	*	*	■	■	■ 凹型	*	*	*	*
1-12		苑裡中溝鄭家古厝	潮州	約1890-1917	三合院＋三橫	■	■	■	□	■	■	*	■	■	□	■ 凹型	東北	傳統灶	竹片石綿造位於室內	□
1-13		苑裡中溝東里家風厝	潮州	約1900-1924	三合院＋五橫	■	■	□	□	■	■	*	*	□	■	■ 凹型	西北	傳統灶	磚造位於室內	■
1-14	E	苑裡中溝保正鄭秋厝	潮州	1930	一條龍	□	□	□	□	□	■	■	□	□	■	■ 直線	外部	*	*	*
1-15	E	苑裡中溝鄭芳厝	潮州	1930	一堂一橫	□	□	□	□	□	■	*	*	□	□	□	*	*	*	*

* 由現場建築觀察，推測原為一堂兩橫，右邊兩橫屋，目前右邊內橫屋已拆除改建為兩層樓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6	E	苑裡中溝鄭泰山厝	潮州	1930	一條龍	□	□	□	□	□	■	□	■	□	□	□	外部	傳統灶	竹片石綿造位於室內	□
1-17	D	獅潭永興張家	廣東	1951		□	■	□	□	□	□	□	■	□	□	□	*	*	*	*
1-18	F	獅潭村史博物館	*	*	一堂	□	□	□	□	□	□	□	■	□	□	□	東北	傳統灶	磚造位於室外	□
1-19	G	銅鑼劉肇方診所	廣東	1949	凹型平面	□	□	□	□	□	□	■	□	□	□	■直線	西北	瓦斯灶	□	□
1-20	B	銅鑼李家隴西堂	梅縣	1935	三合院+兩橫	■	■	■	□	□	■	□	□	□	□	■直線	西北	瓦斯灶	□	□
1-21	C	銅鑼張家清河堂	梅縣	1935	三合院	□	■	■	■	□	*	*	*	□	□	■直線	西南方	瓦斯灶	□	□
1-22	I	西湖彭城堂劉家	廣東	*	三合院+一橫	■	■	□	■	□	*	*	*	□	□	■凹型	未進入	*	*	*
1-24	B	頭屋東海堂徐家	蕉嶺	1932	三合院+一橫	■	■	□	□	■	*	*	*	■	■	■凹型	未進入	*	*	*
1-23		頭份曾家祖厝魯國堂	梅縣	1928	三合院+兩橫	■	■	■	■	■	*	*	■	□	■	■直線	西北	瓦斯灶	□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5	H	頭份東海堂徐家	*	*	一條龍	■	■	■	■	■	*	*	■	□	■	■直線	未進入	*	*	*
1-26	I	頭份彭城堂劉家	廣東	*	三合院＋五橫	■	■	■	■	?	*	*	*	□	□	■直線	未進入	*	*	*
1-27		關西羅氏宗祠	廣東	咸豐年間	三合院	■	■	■	?	?	*	*	*	□	□	□	西北	瓦斯灶	□	□
1-28		關西鄭氏祠堂	饒平	1928 修建	三合院	□	■	□	■	■	*	*	*	□	□	■直線	西北	傳統灶	竹片石繪造位於室內	□
1-29		北埔姜阿新故宅	陸豐	1946	兩層洋樓	□	□	□	□	□	■	□	□	□	□	□	*	*	*	*
1-30	E	峨眉曾家魯國堂	廣東	1935	H 型平面	□	□	□	□	□	*	□	■	□	□	□	獨立	*	*	*
2-1		竹北曾家龍山衍派	同安	*	三合院	□	■	□	□	□	■	*	*	□	■	■線型	*	*	*	*
2-2		竹北曾家東魯傳家	漳洲	1906	三合院	□	■	□	□	□	■	□	■	□	□	■線型	西北	□	□	□
2-3	B	苗栗謝家寶樹堂	閩南	*	三合院	□	■	■	■	□	■	*	*	□	□	■線型	*	*	*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4		苑裡蔡家古厝	泉州	1926	四合院	□	■	□	□	□	■	■	*	□	■	■ 直線	東北 西北	傳統灶 瓦斯	磚造位於室外	□
2-5	H	造橋蔡家分厝濟陽堂	漳州	1930	三合院	□	■	□	□	□	□	*	*	□	□	■ 直線	西北	瓦斯灶	□	□
2-6		造橋蔡家古厝濟陽堂	漳州	1843	三合院	□	■	□	□	□	□	*	*	□	■	■ 直線	東北	傳統灶	室內	□
2-7	H	頭份羅氏宗祠	*	1920	三合院	■	■	■	?	□	*	*	*	□	□	□	西北	瓦斯灶	□	□
3-1		獅潭豆水妹家扶風堂	賽夏族	*	一條龍	□	□	□	□	□	□	*	*	□	□	□	東北	傳統灶	□	□
3-2		獅潭豆建榮家扶風堂	賽夏族	*	一條龍	□	□	□	□	□	□	*	*	□	□	□	東北	□	□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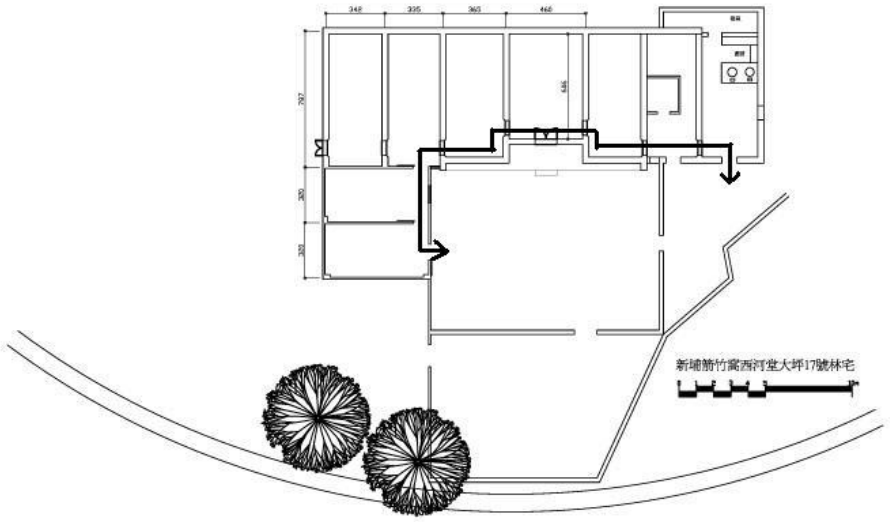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新竹縣新埔鎮箭竹窩西河堂林宅配置圖，有內廊道相通室內各房間。(2009)　本研究繪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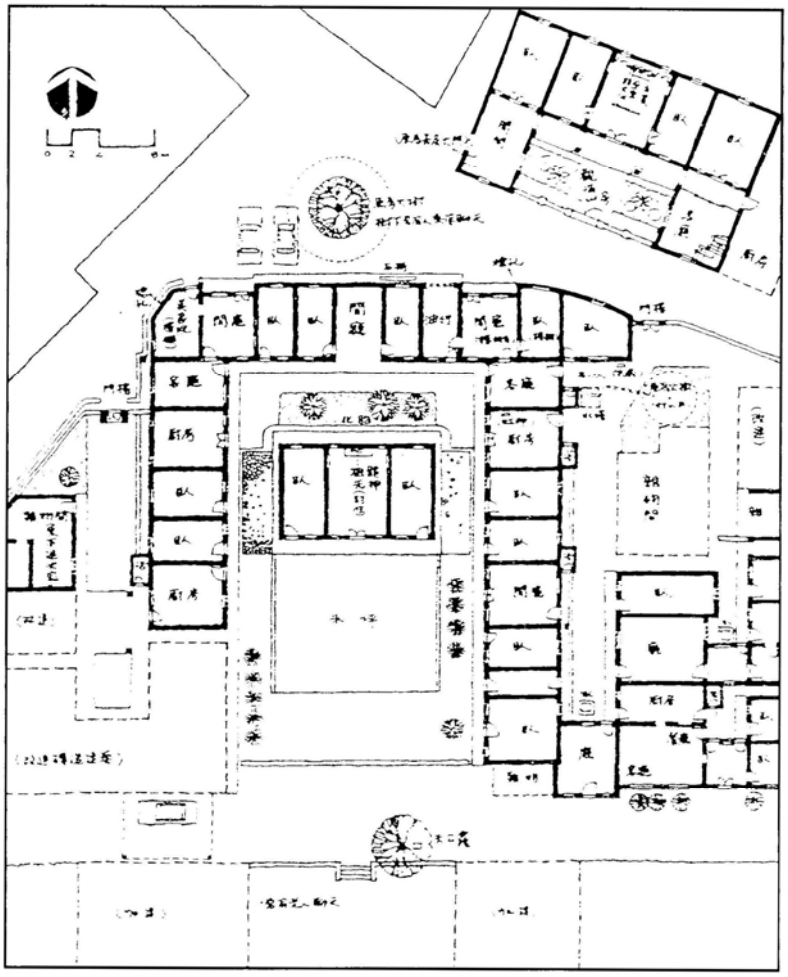


圖-2　臺灣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水劉氏廣玉祖堂平面圖。基本上各房間獨立對外開門。　邱永章，《五溝水——一個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89），頁 159，附圖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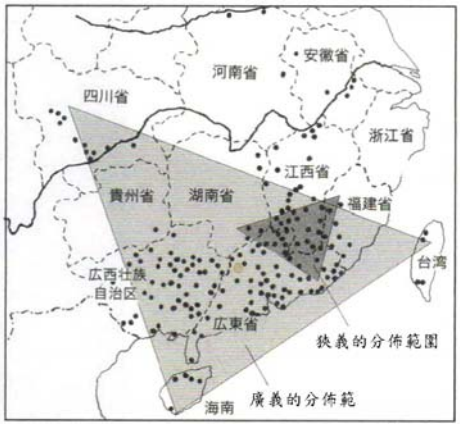


圖-3　中國、臺灣客家人分佈簡圖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收入茂木計一郎等編，《客家民居の世界——孫文、トウ小平のルーツここにあり》（東京：風土社，2008），頁 78，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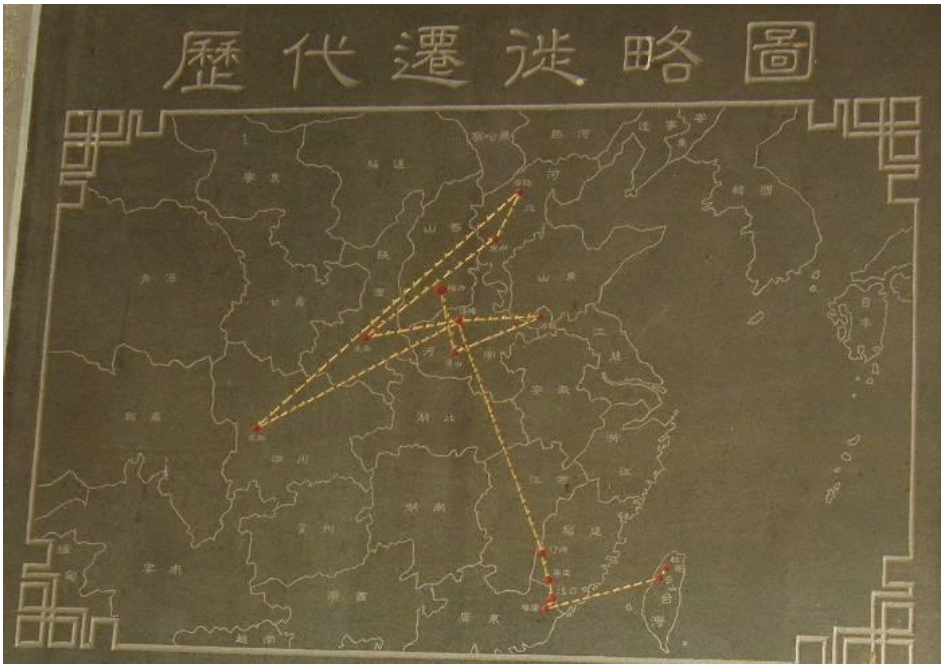


圖-4　臺灣新竹縣新埔鎮上枋寮劉家歷代遷徙圖（2008）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福建省土樓分佈地區示意圖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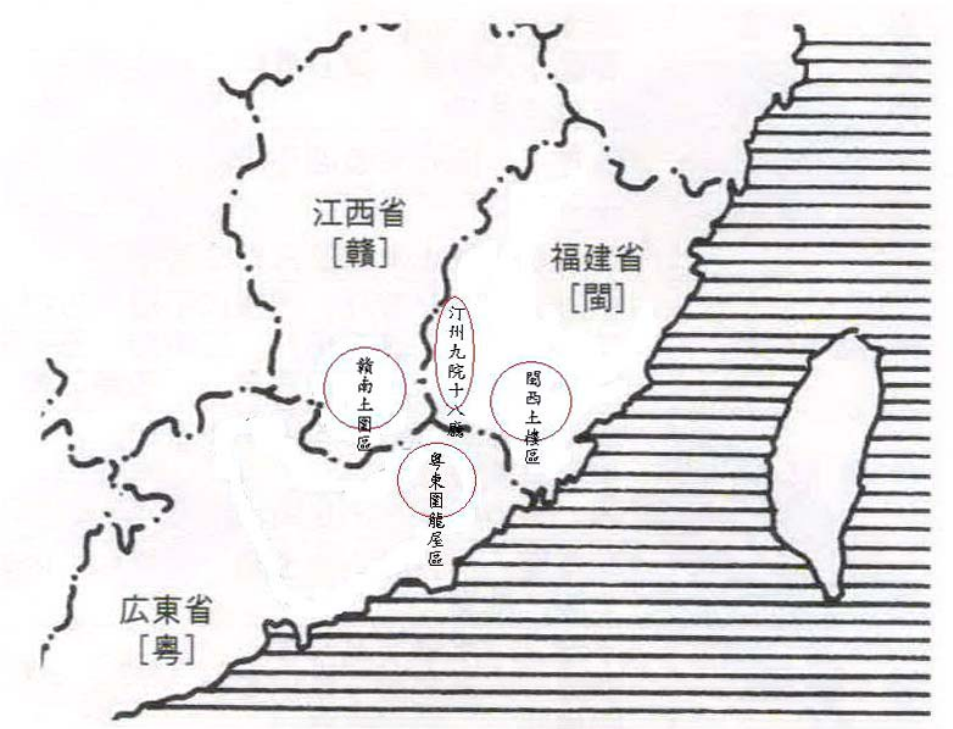


圖-6　客家民居分佈圖（閩西土樓、閩西北九廳十八院、贛南土圍、粵東圍龍屋）　作者改繪自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頁 79，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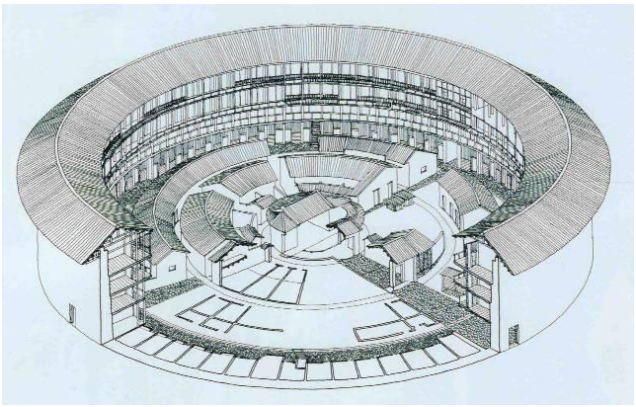


圖-7　閩西永定一帶土樓型態　茂木計一郎等著，《中国民居の空間を探る：群居類住"光.水.土"中国東南部の住空間》，頁 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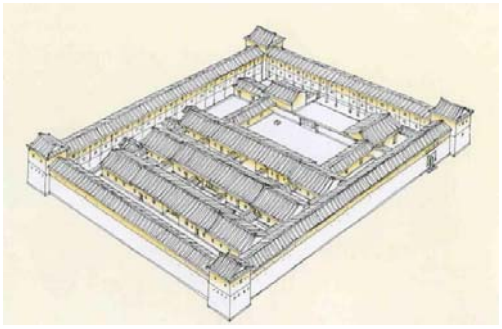


圖-8　贛南「圍屋」型態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頁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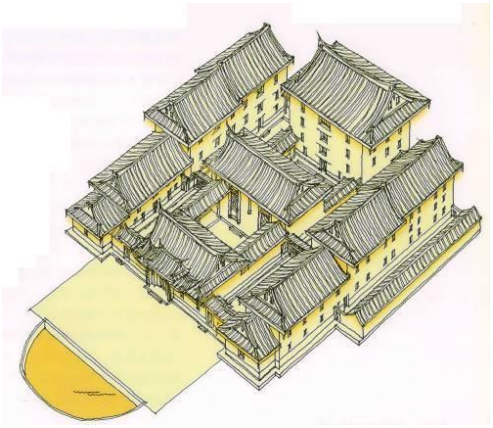


圖-9　閩西五鳳樓基本型態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頁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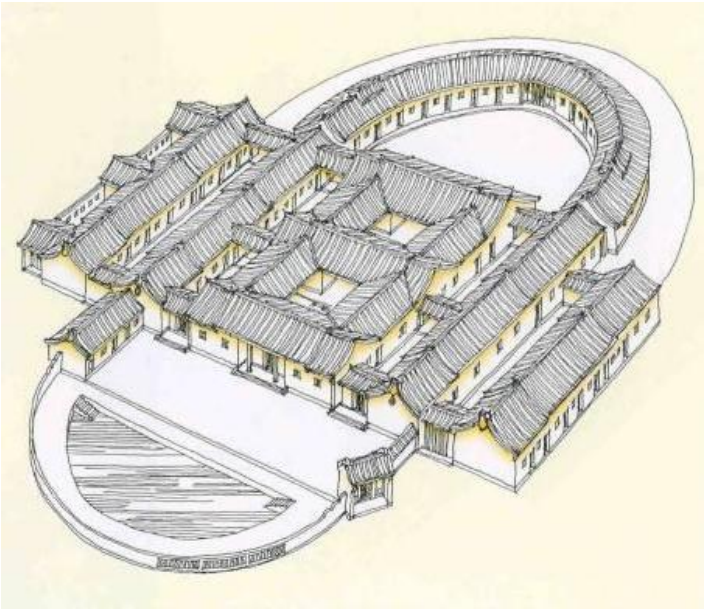


圖-10　粵東「圍龍屋」客家建築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頁 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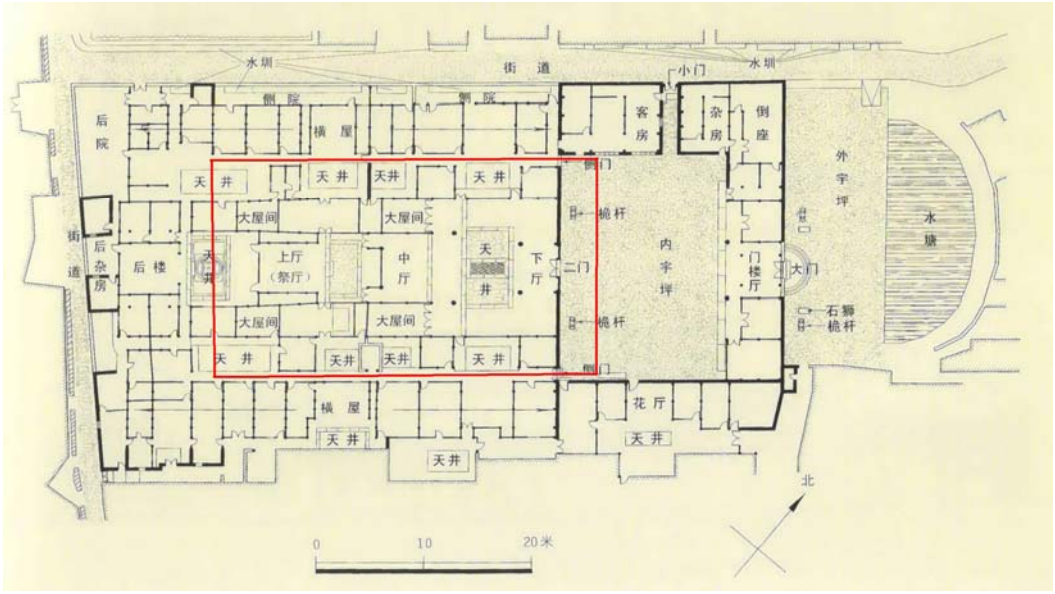


圖-11　汀州府九廳十八院合院住宅　李秋香，《閩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村》，（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頁 157。中間紅線所框的部分，為核心的下廳（下堂）、中廳（中堂）、上廳（上堂）之「三堂」空間排列。



圖-12　福建省汀州培田的「九廳十八院」合院住宅群　吳國平等著，《八百年的村落——培田紀行》（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頁 1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3　福建省塔下村張氏家祠德遠堂（2009） 作者自攝



圖-14　福建省書洋鎮石橋村張氏祠堂追遠堂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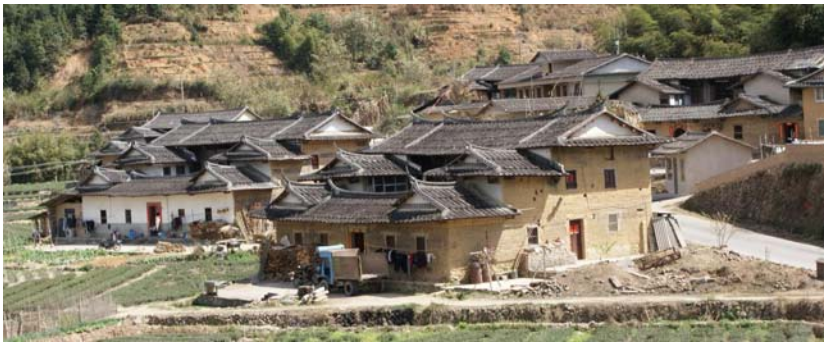


圖-15　相似於福建省永定縣五鳳樓形態的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合院形式住宅（2009）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　東漢末期廣州漢墓陶塢堡明器　廣州博物館編，《廣州歷史文物圖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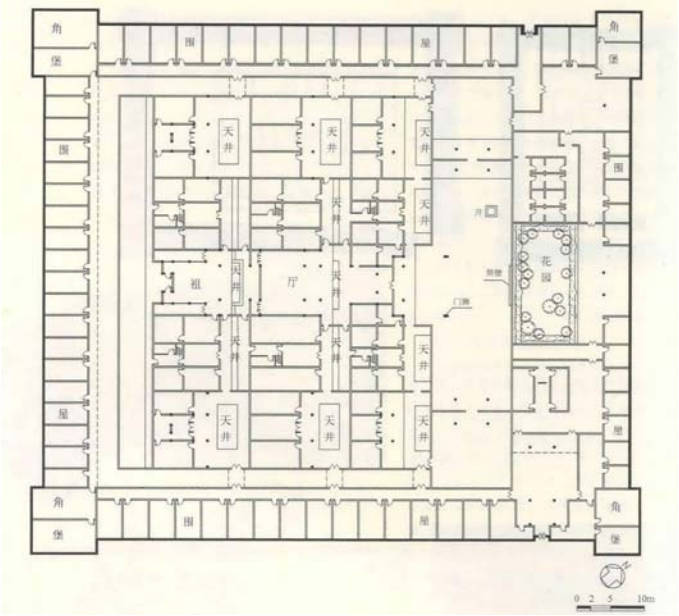


圖-17　江西省龍南關西新圍平面圖　黃浩編著，《江西民居》，頁 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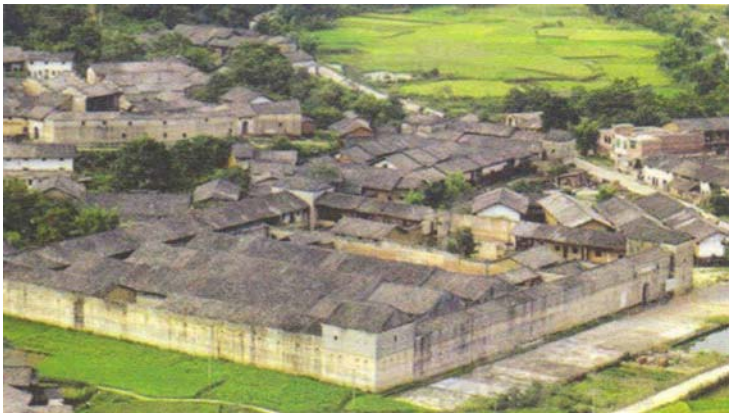


圖-18　江西省龍南關西新圍鳥瞰照片　黃浩編著，《江西民居》，頁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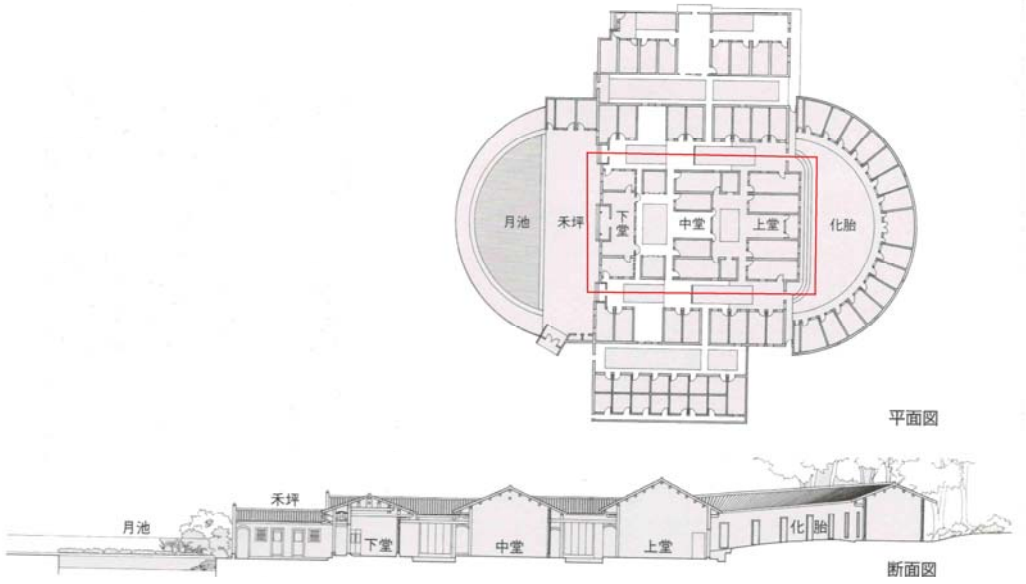


圖-19　廣東省梅縣白宮鎮富良美村隸華居平面圖及中央剖面圖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頁 160。中間紅線所框的部分，為核心的下堂、中堂、上堂之「三堂」空間排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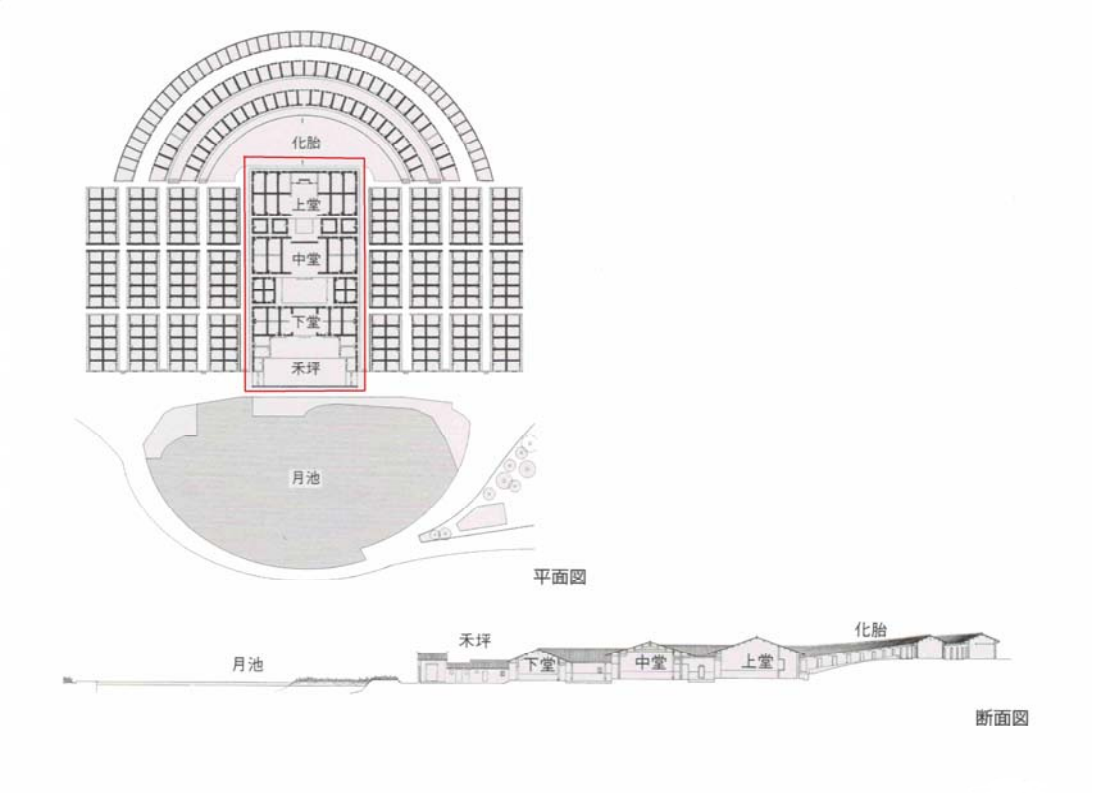


圖-20　廣東省梅縣丙村鎮豐村仁厚溫公祠平面圖及中央剖面圖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頁 164。中間紅線所框的部分，為核心的下堂、中堂、上堂之「三堂」空間排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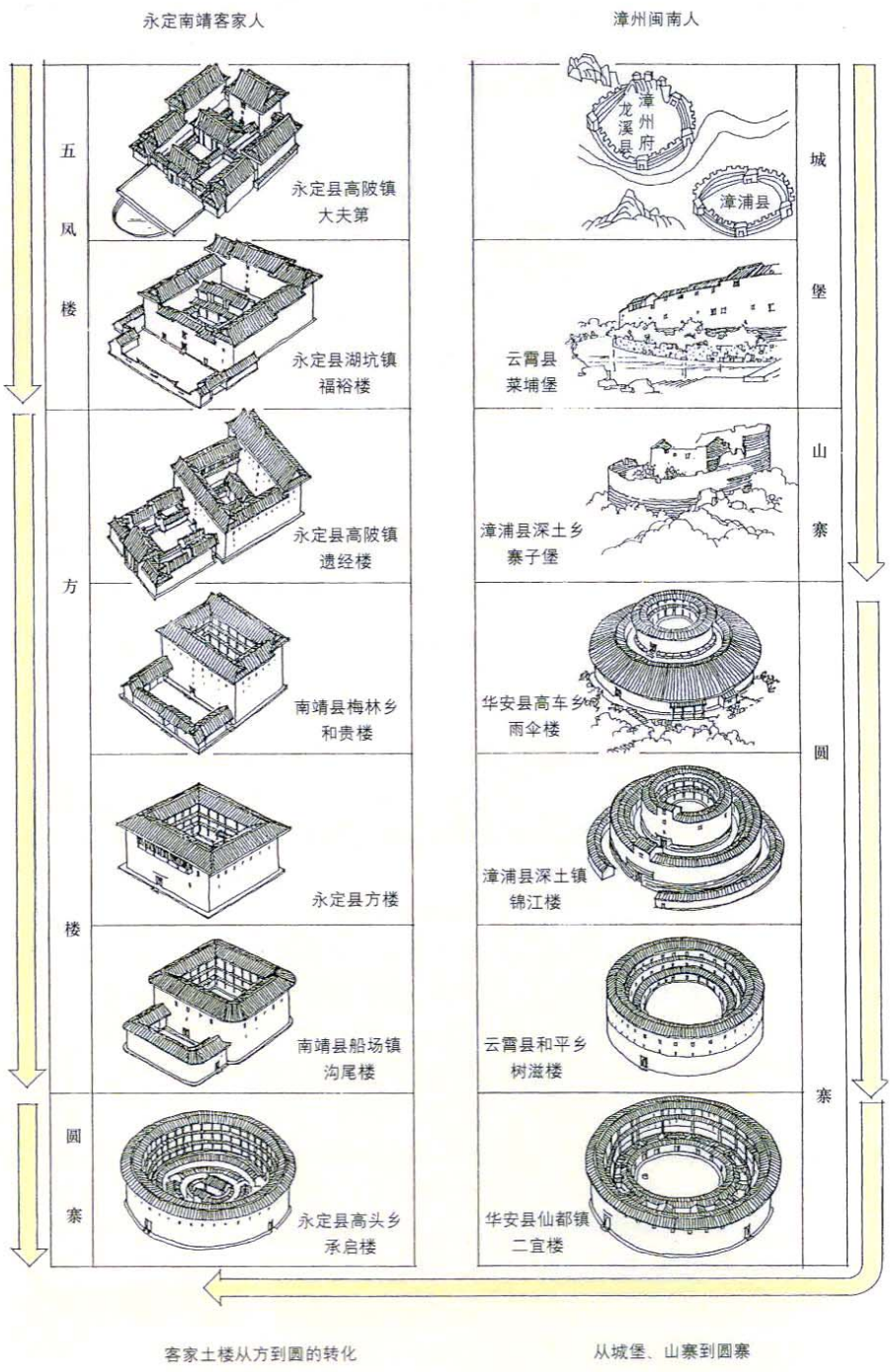


圖-21　閩西閩南土樓興建發展順序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頁 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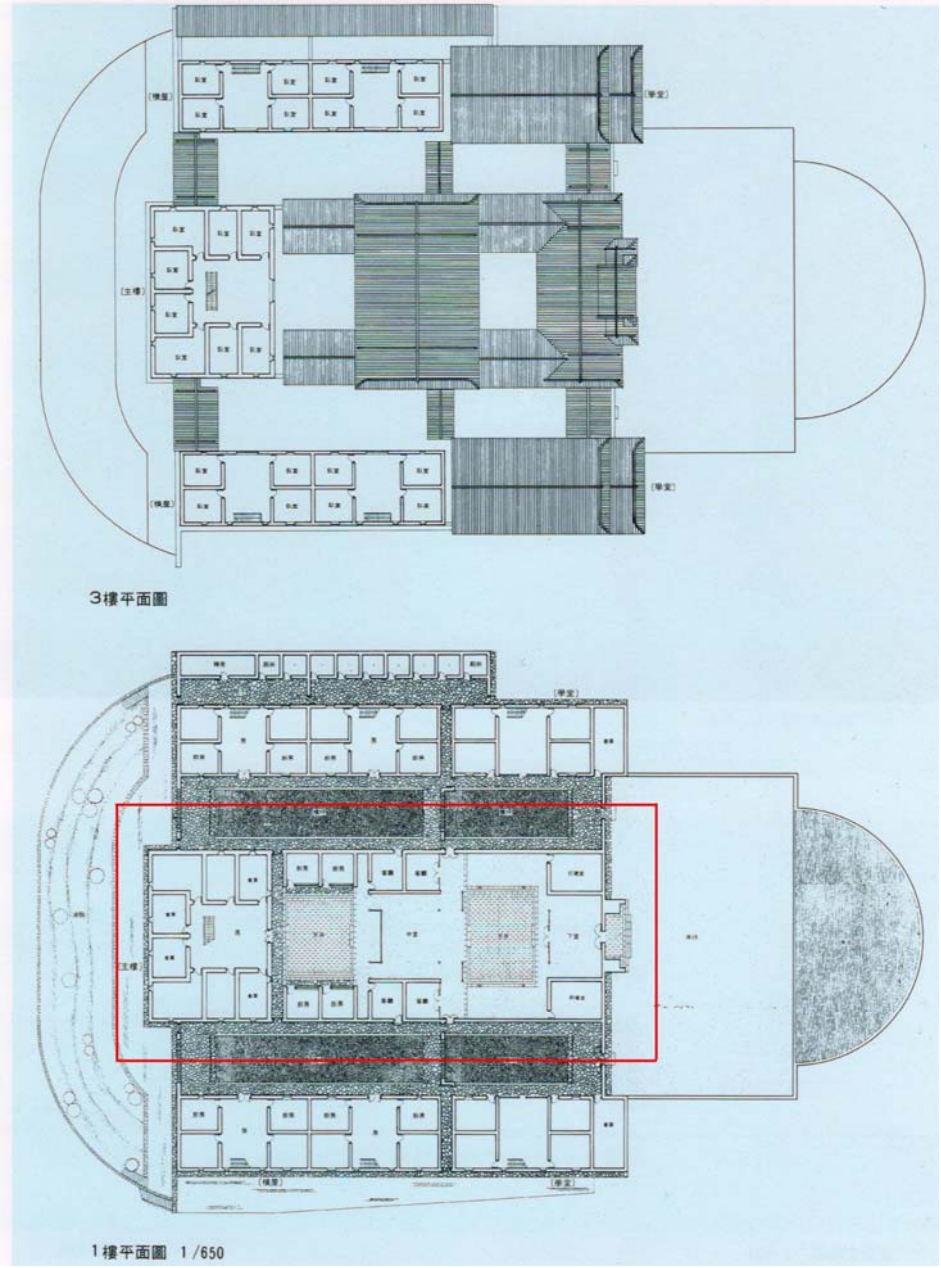


圖-22　福建省永定縣大夫三堂兩橫一樓與三樓平面圖。　片山和俊，〈土楼の住まいと調査の概要〉，《中国民居の空間を探る》，頁 166。中間先所框的部分為核心的下堂、中堂、上堂之「三堂」空間排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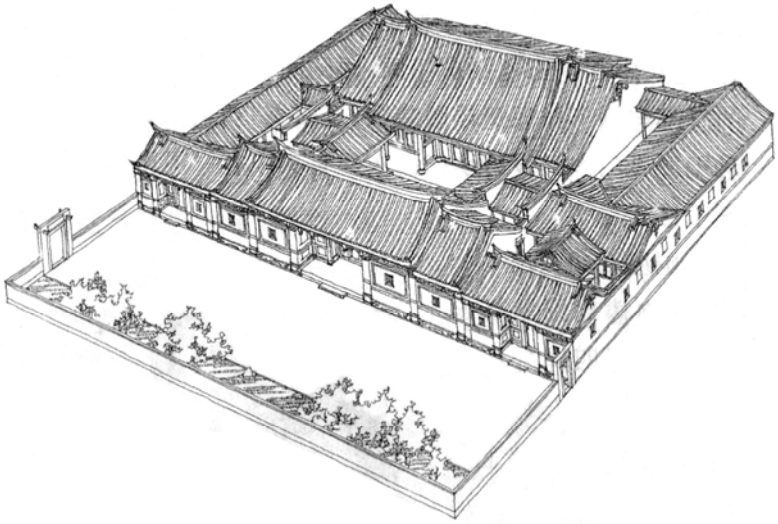


圖-23　閩南護厝式民居：泉州楊阿苗宅鳥瞰圖　黃漢民，《客家土樓民居》，頁 92。



圖-24　福建省泉州市亭店楊阿苗宅　黃漢民，《福建傳統民居》（廈門：鷺江出版社，1994），頁 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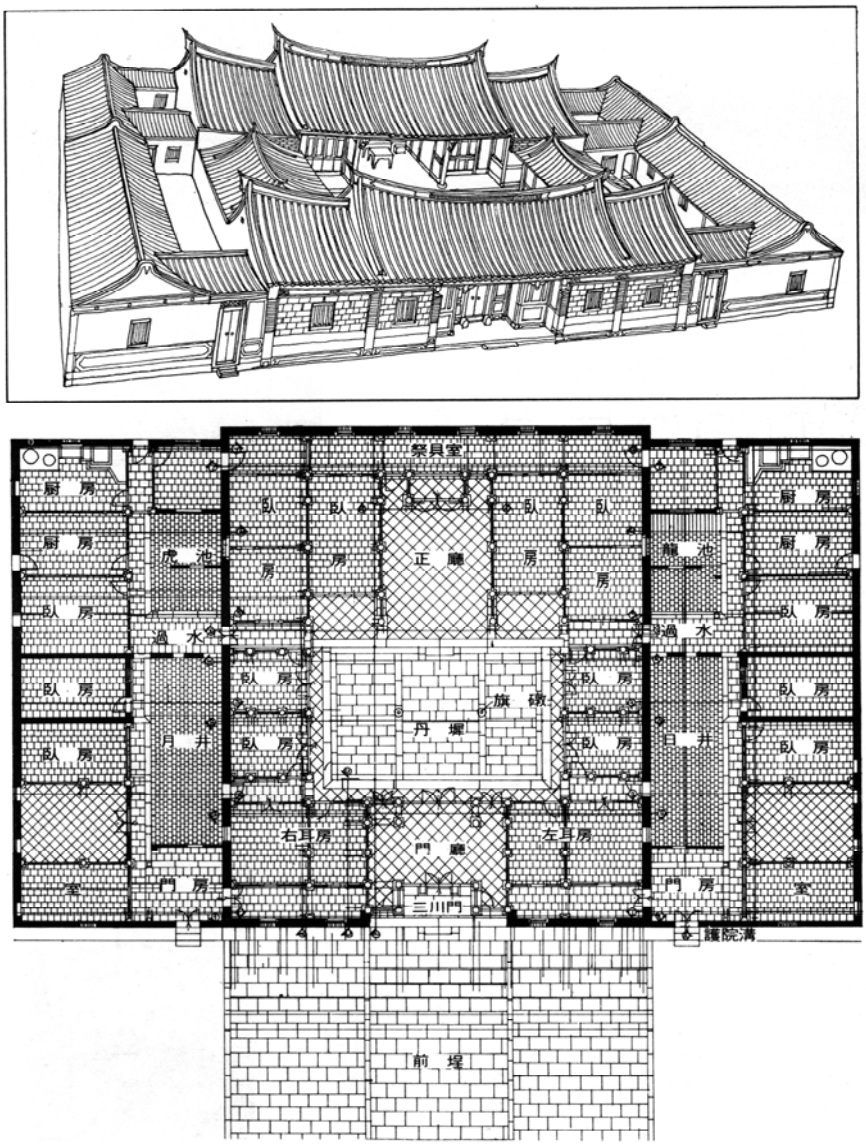


圖-25　臺灣臺北市泉州安溪系林安泰宅鳥瞰圖與平面圖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頁 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6　福建省書洋鎮塔下村張氏家祠德遠堂（2009）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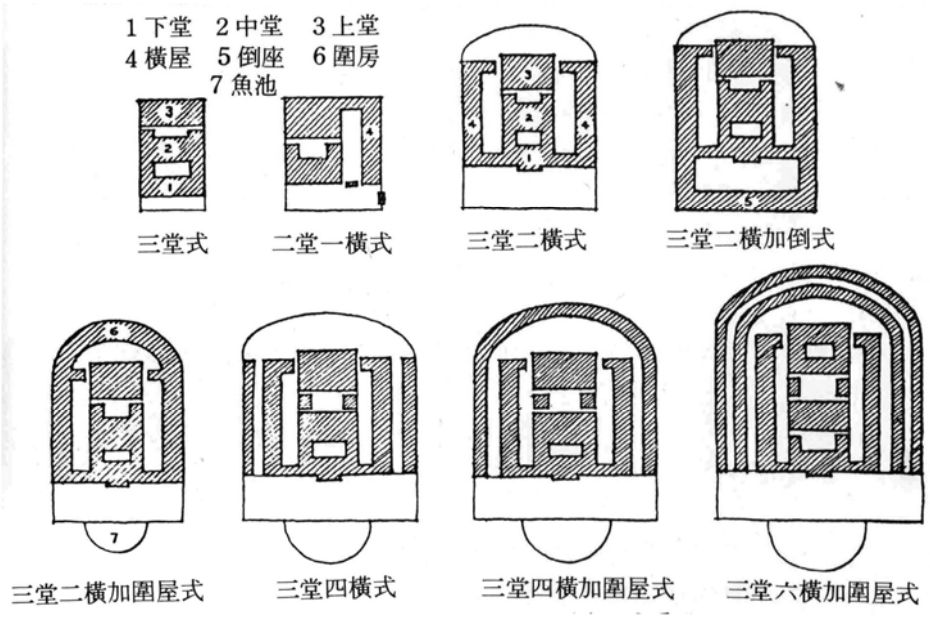


圖-27　廣東省圍龍屋建築類型　劉敦楨，《中國住宅概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8　臺灣新北市板橋區林三落大厝（2007）　作者自攝



圖-29　臺灣屏東縣佳冬鄉客家住宅蕭宅（照片中央部分為第二進至第五進）　中央社 http://www.epochtimes.com/b5/4/6/27/n580520.htm（2010 年 12 月 27 日讀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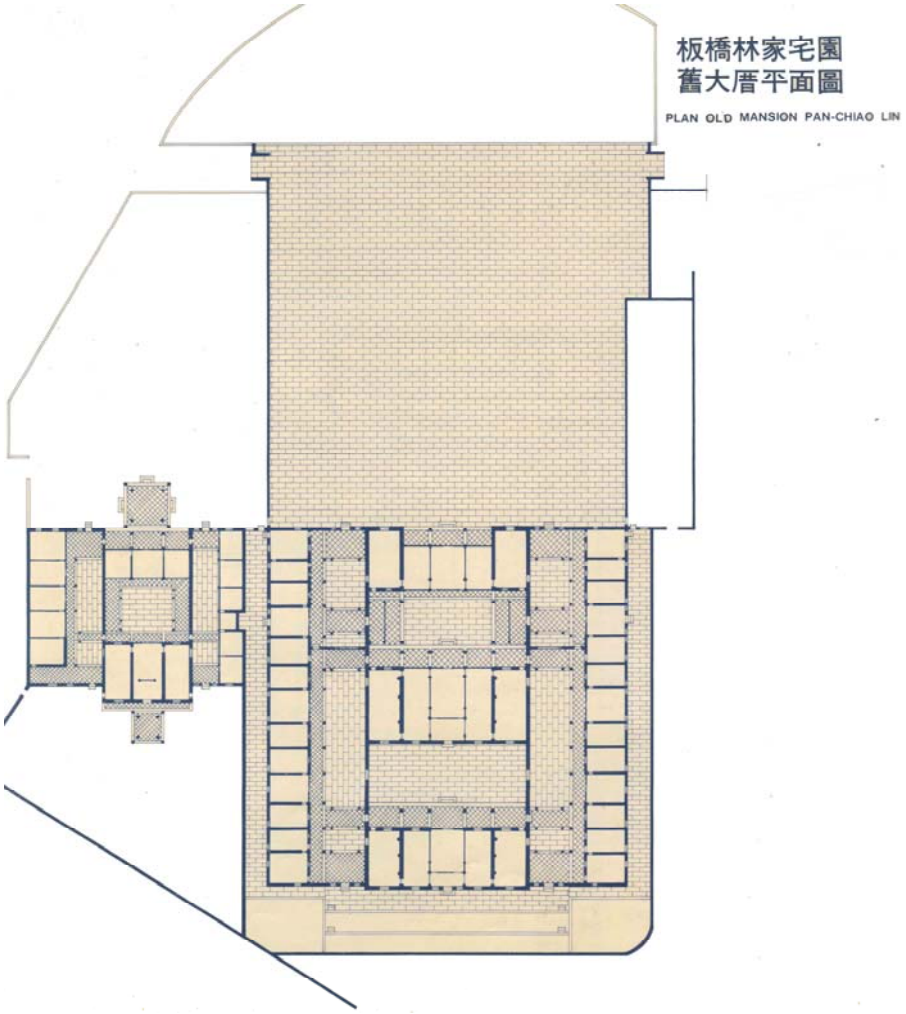


圖-30　臺灣新北市板橋區林家三落大厝及弼益館平面圖　漢寶德、洪文雄，《板橋林宅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臺中：東海大學建築系，1963），頁 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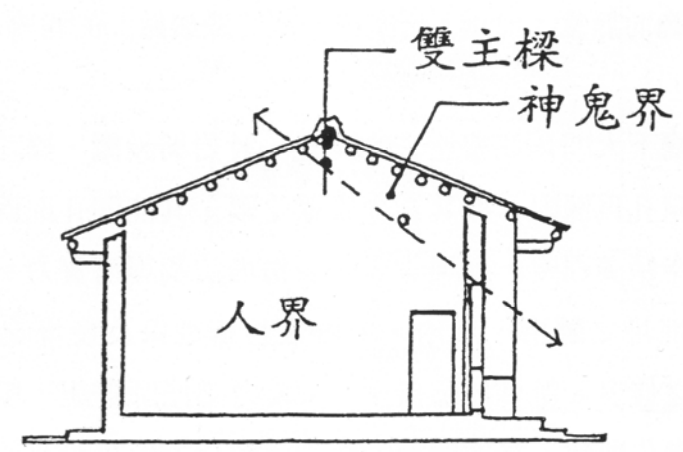


圖-31　臺灣南部六堆客家建築裡雙主梁（雙棟）的位置示意圖　陳淑玲，《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建築篇》，頁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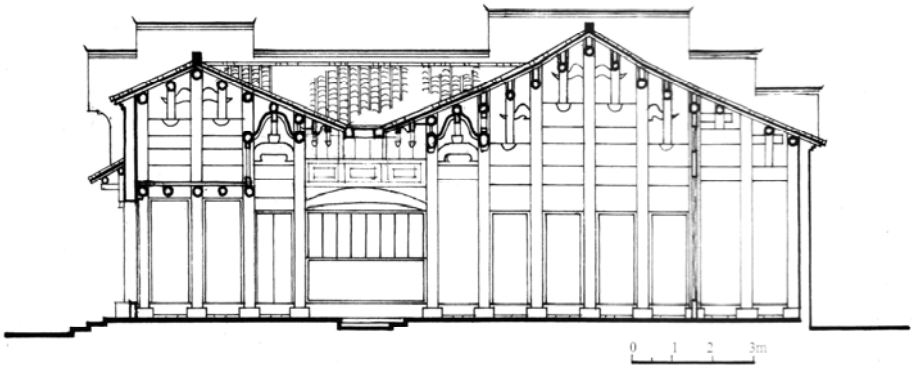


圖-32　江西省波陽縣江家山村某宅剖面圖（村委會）　黃浩，《江西民居》，頁 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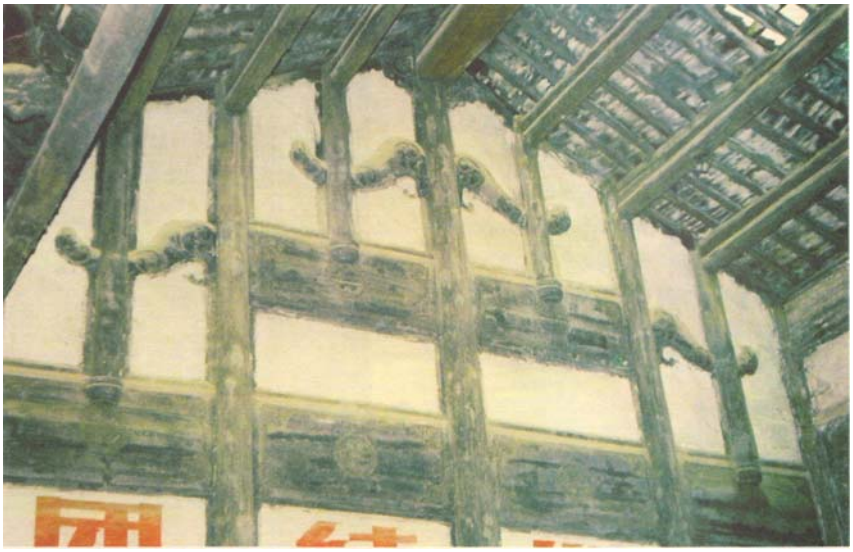


圖-33　江西省波陽縣江家山村某宅架棟結構（村委會）　黃浩，《江西民居》，頁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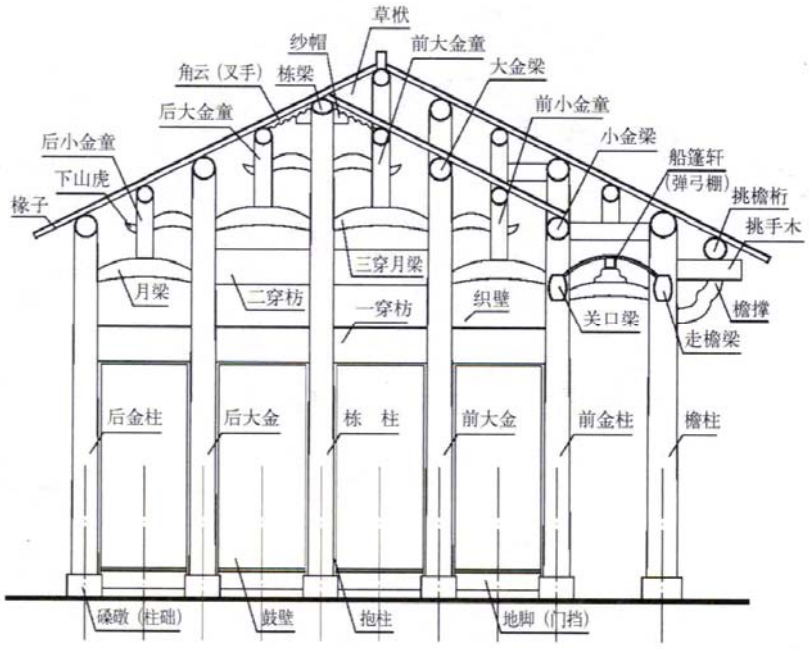


圖-34　五柱九檩構架圖　黃浩，《江西民居》，頁 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5　江西省典型穿斗式木結構　黃浩，《江西民居》，頁 95。



圖-36　江西省傳統屋架架棟三花樑圖　黃浩，《江西民居》，頁 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福建省長汀縣賴氏坦園祠(2009)　作者自攝



圖-38　福建省長汀縣賴氏坦園祠(2009)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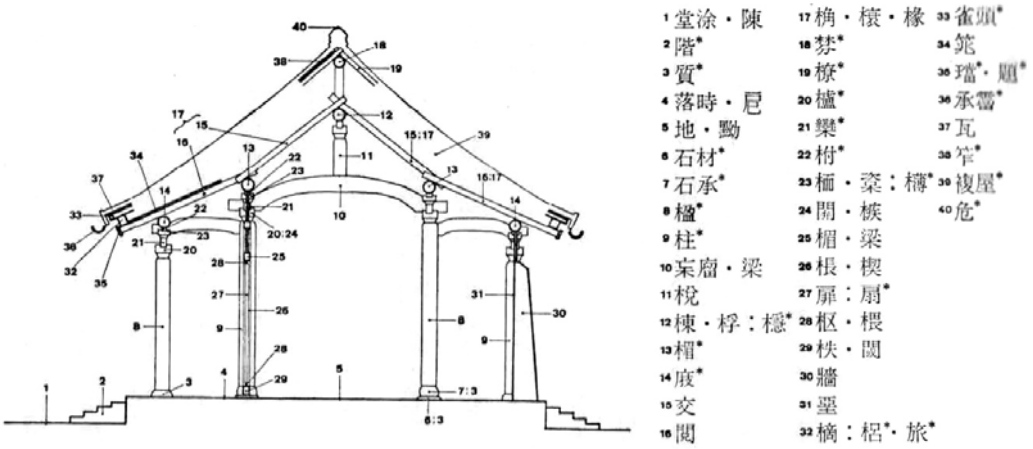


圖-39　中國建築上古時代五架屋復原圖五架屋復原圖　田中淡，《中国建築史の研究》，頁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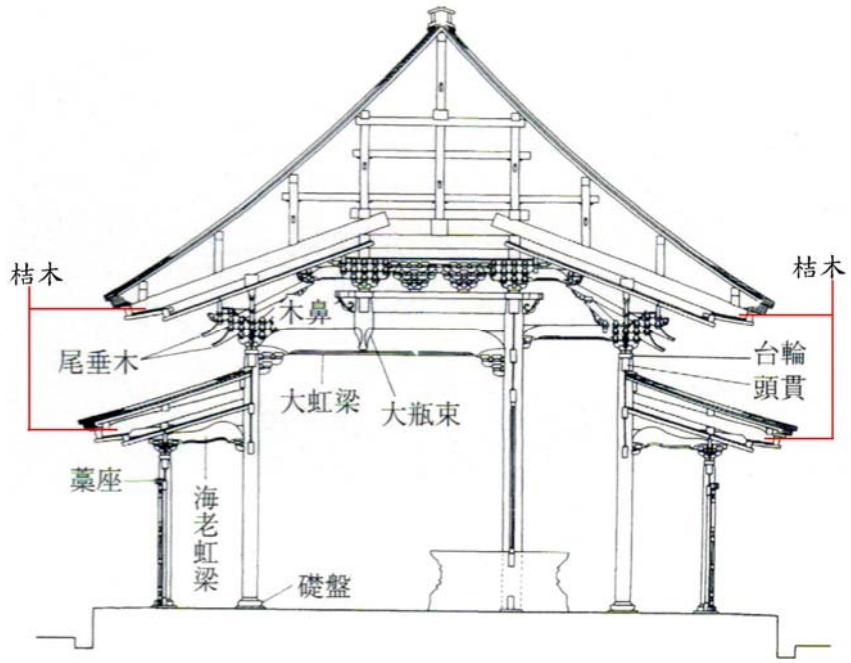


圖-40　15 世紀前半興建的禪宗建築日本圓覺寺舍利殿剖面圖
日本建築學會編，《日本建築史圖集》，頁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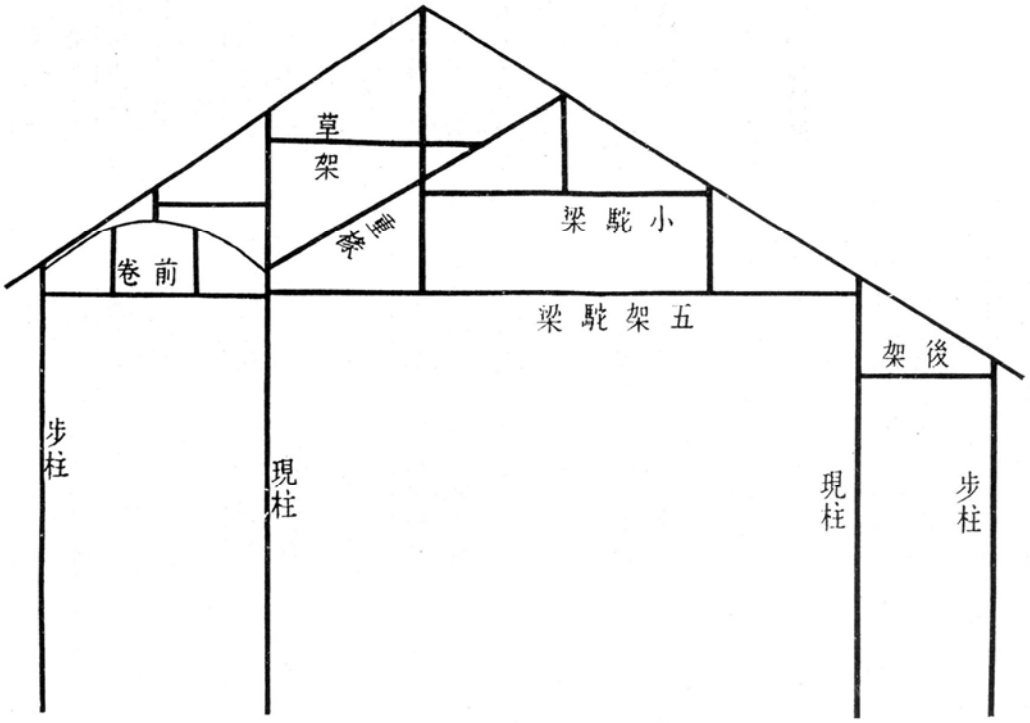


圖-41　《園冶》所載「草堂架」　計成，《園冶》，崇貞辛未（1631年）成書，1922 年喜詠軒叢書本（涉園陶氏依崇禎本重印），收入叢書集成續編 九一，（臺北：新文豐，1989），卷 1，頁 10。



圖-42　苗栗縣西湖鄉彭城堂（2009）前埕的圍牆呈凹字型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3　北京市紫禁城午門（清順治 4 年（1647）重建）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編集委員會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第 9 冊（東京：小學館，2001），頁 21。



圖-44　東漢鳳闕圖（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鄉，西元 2 世紀）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編集委員會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第 1 冊（東京：小學館，1997），頁 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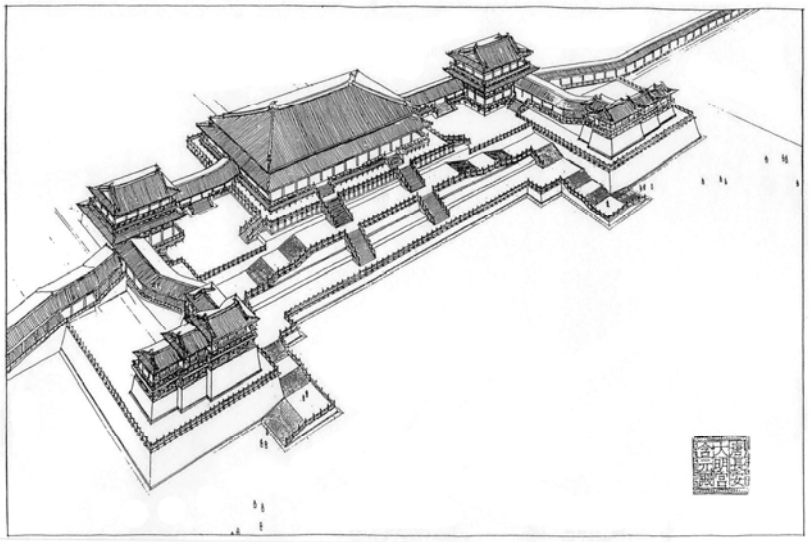


圖-45　唐大明宮含元殿復原圖（楊鴻勛的復原圖）　楊鴻勛，〈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復原再論〉，《唐大明宮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4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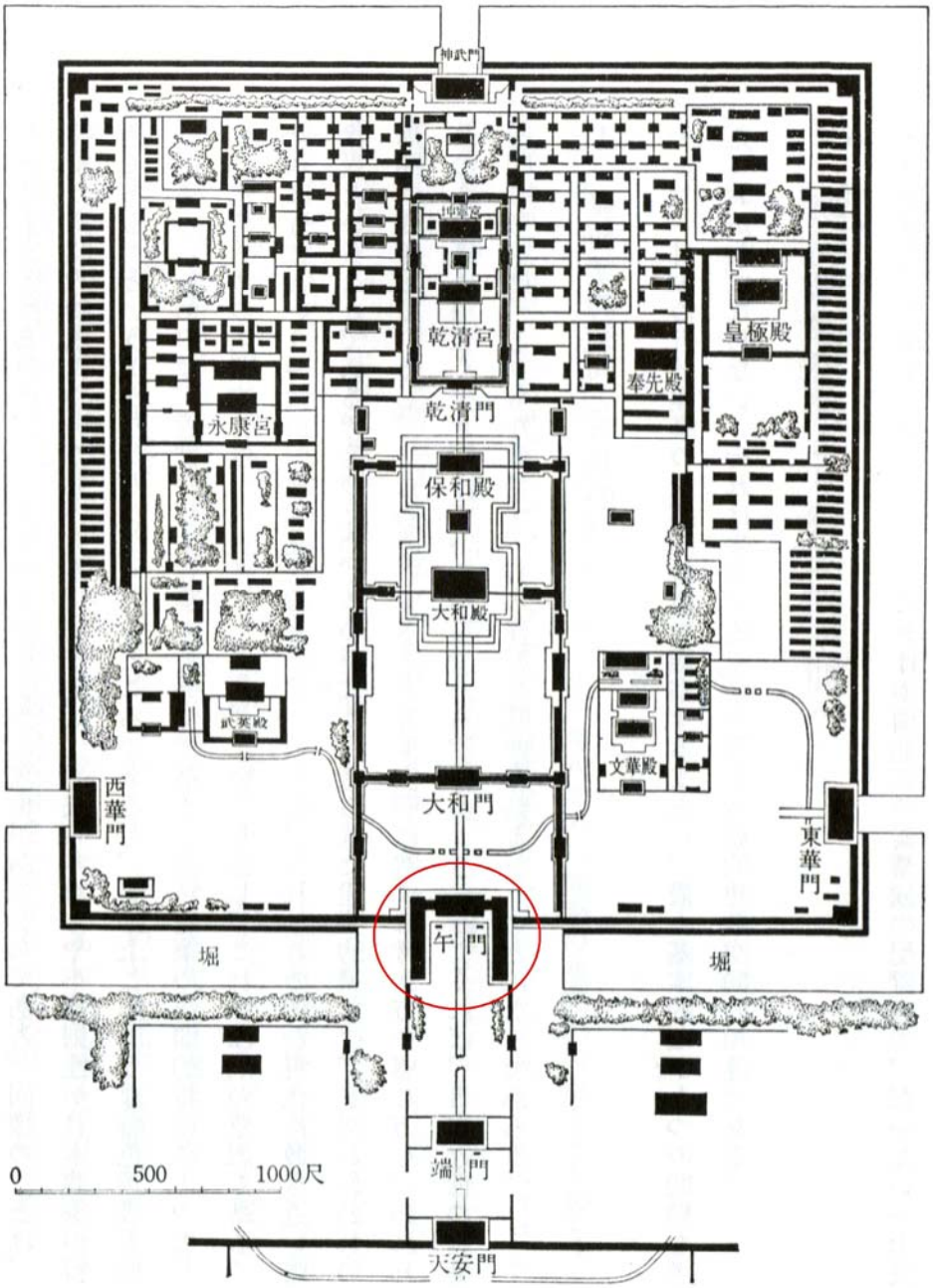


圖-46 北京市紫禁城平面 底圖伊東忠太繪製，此處引自井上充夫著，《日本建築の空間》(東京：鹿島出版會，1969)，頁 2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中川理江，《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爲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太田博太郎，《日本建築史序說（增補新版）》（東京：彰國社，1988）。

王雯君，〈廖倫光評「臺灣爲何沒有土樓？」〉，收錄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 24 期（2005）。

片山和俊，〈土楼民居と集落〉，《客家民居の世界》（東京：風土社，2008）。

田中淡，《中國建築史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89）。

田中淡，〈建築〉，收錄於舜臣、尾崎秀樹監修，《『中国』世界の歴史と文化》（東京：新潮社，1993）。

田中淡，〈隋・唐時代の建築〉，收錄於《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篇》第四冊（東京：小學館，2001）。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 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伊東忠太，《東洋建築史の研究（上）》（東京：龍吟社，1936）。

東京芸術大学中国住居研究グループ（茂木計一郎代表），《中国民居の空間を探る》（東京：（有）建築思潮研究所，1991）。

李允斐，〈由南北產業的差異看客家民居形式〉，收錄於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志》上冊，高雄：美濃鎮公所，1996 年。

林浩著、藤村久雄訳，《アジアの世紀の鍵を握る客家の原像：その源流、文化、人物》（東京：中公新書，1996）。

房學嘉、謝劍著，《圍不住的圍龍屋——記一個客家宗族的復甦》（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與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1987）。

高木桂蔵，《客家——中国の内なる異邦人》（東京：講談社，1991）。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 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年。

陳信雄，《磚瓦之美》（臺南：六甲鄉公所，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淑玲、賴福林，《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建築篇》（屏東：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
黃浩編著，《江西民居》（北京：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
黃漢民，《客家土樓民居》（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黃漢民，《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北京：三聯書店，2003）。
黃蘭翔，〈高雄美濃客家建築遺風所說的漢人建築空間的本質——以化胎與墓塋型土地公爲中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
黃蘭翔，〈漢人の『宗族倫理風水観』からみた臺湾の伝統的民家〉，收錄於玉井哲雄編，《歴博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2008　アジア比較建築文化史の構築―東アジアからアジアへ―報告書》，佐倉：国立歴史博物館，2009。
詹慧玲編校，《臺灣的建築》（臺北：臺原出版，1993）。
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註疏》，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劉熙，《釋名》，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劉璈，《巡臺退思錄》，臺灣文獻叢刊 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劉敦楨著，《中國住宅概說》（北京市：建築工程出版社，1957）。
劉敦楨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1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文獻叢刊 第 4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 第 171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鍾心怡主持，《新竹縣傳統聚落與傳統建築調查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委託，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kkanese Architecture in Taiwan: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Huang, Lan-shiang*

Abstract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Hakkanese architecture in eastern Guangdong and western Fujian in 2008 and other studies, it is clear that Hakkanese architecture exhibits different styles in western Fujian, eastern Guangdong, and southern Jiangxi. There is no one style that is representative of Hakkanese architecture in China.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e from these three provinces shows that they share a common type of building, namely the *heyuan jianzhu* (合院建築) or courtyard compound. Yet, because of climate influence and soci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localit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this courtyard compound evolved into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buildings. Thus far, researchers have believed that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ere unchanged in their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Taiwan, but this is not always true. Consequently, Hakkanese architecture is not static but always changing depending o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shows that double ridge poles were put on the top of gable walls under the roof, which is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two-layer roof structure. Double roofs have existed from ancient times in China.

Keywords: Taiwan Architecture, Hakkanese Architecture, Hometown of Hakkanese, Double Ridge Poles, Remote Place and Central Palace, Chinese Architecture.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